

清初鄭芝龍在京活動與黨爭涉入： 兼論黃道周案歷史書寫

盧正恆*

摘要

鄭芝龍是受到廣泛關注的歷史人物，不僅是十七世紀中西交流史的縮影，也是影響中國史進程的要角。雖然學術界已從中外文材料探究他精彩的一生，但對鄭芝龍降清後的認識相當有限。在有限的研究中，鄭芝龍僅是被大清軟禁、勸誘鄭成功的人質及忠義鄭成功、黃道周的相對面。本文首先論述鄭芝龍旗籍隸屬，同時闡述其在北京的人際網絡及涉入順治朝黨爭。最後，從文人、遺民的書寫來理解清初有關鄭芝龍的歷史敘事，如何從單純的跋扈到結合黃道周之死的歷史記憶和解釋，自順治末到康熙年間被視為一體出現，並在乾隆朝被廣為利用，遂形成官方歷史書寫的定論。

關鍵詞：鄭芝龍、明清鼎革、多爾袞、黃道周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同安侯鄭芝龍，拜國家之重爵，為殿陛之親臣，更有與國休戚之誼。¹

此話出於順治十一年（1654）浙江福建總督劉清泰（?-1665）之語。作為與敵我關係不明的鄭成功（1624-1662）接觸之第一線，劉清泰如既往多數朝臣之建議，望朝廷能命「重爵親臣」鄭芝龍（1604-1661）撰寫家書，宣諭勢力高漲的鄭成功投降，將可達「則父子之忠孝有光大典，而內外之安攘並著奇勛矣。」這段文字不單是來自前線的戰略建言，也展現當時清廷大員對於鄭芝龍的想法——鄭芝龍高官厚祿、伴隨皇帝左右，理當與大清帝國共患難、並效力朝廷。²學界對於鄭芝龍降清後在北京之狀況，僅粗淺地認知其受監視軟禁及被清廷利用為招撫鄭成功的人質。除此，對於其在北京生活可謂一無所知，對於其失勢的認識也傾向從鄭成功的角度來理解，好似鄭芝龍形同虛設、毫無個人主動性，僅是歷史演變、鄭成功之所以「成功」過程之襯托。

學界對於鄭芝龍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段。第一時段聚焦於明末鄭芝龍的海上活動，從經商、海盜、海外關係為主軸之論述。³第

¹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噶達洪等題為詔使交回原頒敕印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臺灣文獻匯刊》，第6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頁53。

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99），甲編，第4本，頁329，〈浙江福建總督劉清泰奏本〉，順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³ 有關鄭芝龍在明末之海上活動相關研究豐富，不勝枚舉，以下試舉幾處例如 C. R. Boxer, "The rise and fall of Nicholas Iquan (Cheng Chi-lung)," *T'ien Hsia Monthly*, 11: 5 (April-May, 1941), pp. 401-439; Leonard Blussé, "Minnan-jen or Cosmopolitan? the rise of Cheng Chihiung alias Nicolas Iquan," in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ed. Eduard B. Vermeer (Leiden: Brill, 1990), pp. 245-264; Tonio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Tonio Andrade,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Weichung Cheng,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Leiden: Brill,

二時段約與南明史重疊，主要集中在鄭芝龍身為南明將領的決策和產生之影響。⁴最後一種是探索鄭芝龍在清、鄭和談過程扮演的角色。⁵相關研究可謂重明末而輕清初，使他從舉足輕重的海疆將領、南明重臣、東亞要角，在投降清廷後，卻被長期忽略；以致於一項普遍刻板印象是「鄭芝龍降清後淪為旁觀」。造成此現象的主因一來是由於鄭芝龍降清後的相關史料缺乏，二來則因早年受到民族主義史觀的影響，與作為「民族英雄」之子鄭成功的忠孝本質相比，認為鄭芝龍背主降清是為不忠。⁶與此點呼應的還有鄭芝龍不忠體現於「害死」一代鴻儒黃道周（1585-1646）之論述。有關以鄭芝龍作為佐證黃道周、鄭成功忠孝節義的說法，約在乾隆年間形構為定論。因此，學界對於鄭芝龍在清初的活動，幾乎陷入「不忠不義」的窠臼中無法跳脫。

確實，迄今所發現的史料指出鄭芝龍在北京時期，無論是政治、軍事或政治方面均未有決定性影響或舉措。然而，筆者曾為文論證此時鄭芝龍的貢獻，實際上他是鄭氏集團情報網制定決策之關鍵。⁷既然鄭芝龍即使到了北京仍在鄭氏集團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那他在北京的活動——而非被軟禁監控，就成為重新認識明清鼎革時期清、鄭關係的關鍵之一。因而理解鄭芝龍在北京不僅可補足鄭芝龍個人經歷的生命史空缺，亦可以了解明清鼎革

2013); Xing Hang, *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 1620-17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等。

⁴ 這些研究主要是南明史的討論，例如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等。

⁵ 例如陳在正，〈鄭芝龍在清鄭和談中所扮演的角色〉，《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88：3（廈門，1988.6），頁117-124；吳正龍，《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⁶ 關於民族英雄建構產生的國族想像之影響，可參見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臺北，2000.6），頁77-158。

⁷ 參見盧正恒，〈賊諜四出廣招徠：鄭氏諜報網、清帝國初期的東南海島認識與《臺灣略圖》〉，《臺灣史研究》，26：1（臺北，2019.3），頁1-58。

過程中，清帝國對於招撫而來的降將之對待。

此外，明清鼎革做為重要轉折，明遺民、貳臣等相關研究，不少涉及有關人物意象、評價等，其歷史觀點則會受到各種因素影響；例如鄭成功的意象就與民族主義的興起有密切關係。⁸鄭芝龍最廣為人知的形象之一就是「害死黃道周」，這樣的描述是從何而來？鄭芝龍至少在乾隆年間已經成為官方歷史書寫中的「符碼」，作為反面教材來對比明末「忠義人士」。實則，此對比並非出自官方指示，而是透過文人的紀錄做為開端；而此開端的源頭則與順治中期黨爭糾葛在一起所誕生的歷史記憶、建構，本文則試圖探索此相關的敘事。⁹

「明清鼎革」是史學界長期關注之主題，例如從地理空間較大的東亞地區，諸如朝鮮的「尊明奉清」作為朝貢國、小中華，清興明亡過程中，意識形態的改變；日本的「華夷變態」也是相似的脈絡，對鼎革產生的變化多有關注，之後的多元交流也帶給日本衝擊和影響。¹⁰從較小的個人而言，有探悉明亡後士大夫如何

⁸ 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臺北：三民書局，2006）。

⁹ 類似探索這樣脈絡的研究有例如李卓穎，〈易代歷史書寫與明中葉蘇州張士誠記憶之復歸〉，《明代研究》，33（臺北，2019.12），頁1-60。又，例如王成勉討論明末清初士人有關抉擇之討論，參見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2012）。其他如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09）。林麗月，《奢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王瓊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變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4（臺北，2004.3），頁39-103。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ard J. Peterson 主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頁367-418。吳志鏗，〈清遺民的晚清記憶——劉聲木的個案研究〉，收入李國祈主編，《郭廷以先生百歲冥旦紀念史學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頁315-353。金澤中，《明清之際在野知識份子的歷史意識——以談遷《國權》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9）；顧敏耀，〈海國英雄形象衍異與文學符碼重層解讀——臺灣清領時期古典詩中的鄭成功〉，《明道通識論叢》，9（2010.12），頁53-80。

¹⁰ 例如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

選擇殉國與否、死生抉擇、寄情詩文繪圖、寄寓現實生活狀況之討論；也有士人、女性、貳臣關於仕途、生死的選擇、記憶之變化、文本書寫中的重塑歷史等層面，都已收到學界各種面向的關注。¹¹通過士人在易代時期的書寫和記憶創造，亦建立有關人物的歷史記憶。¹²過去的分析多集中「正面」人物，對「反派」（villain）之討論較為少見。然而，由於歷史記憶和解釋幾乎已對鄭芝龍降清後作出定論，本文嘗試通過一手史料逐步理解這位「背信棄義」者的歷史記憶和解釋，或將有助於在討論大義名份者、殉國忠君者以外的群體。

本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滿文檔案為主，揭示細節論述鄭芝龍在北京仍維繫龐大商業網絡和事業，仍過著殷實生活外，透過這些財富和交際手腕打造出在朝廷各層級的人脈網絡，加上投降之初隸屬權傾朝野的多爾袞（1612-1650）旗下，因此在人脈、物質生活上都與「軟禁」或「脅持」相去甚遠。第二部分則探討多爾袞倒臺、鄭成功拒絕招降提案、南明勢力反攻，鄭芝龍被動地牽連入黨爭，彈劾也隨之出現，並且多來自明末大儒黃道周過去的友人或門生，最終清廷將之軟禁北京、之後流放盛京、寧古塔；待康熙帝（1654-1722，1661-1722在位）即位後，被處斬。第三部分將聚焦點移往黨爭後，有關黃道周之死和鄭芝龍不忠的歷史論述，通過歷史書寫創造出影響後世之記憶。本文嘗試還原過往仍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 ¹¹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例如陳逸雯有關朱中楣的女性視角，如何在夫君為貳臣、但出身朱明宗室身分對此易代劇變中，對於家國變化的感受和痛楚；參見陳逸雯，〈入山猶未晚：明宗室朱中楣的易代經歷與鄉國書寫〉，《明代研究》，31（臺北，2018.12），頁51-80。有關於心態的分析，可參見Lynn A. Struve, "Confucian PTSD: Reading Trauma in a Chinese Youngster's Memoir of 1653," *History & Memory*, 16:2 (Fall/Winter 2004), pp. 14-31；例如張繼瑩將《偏關志》作為明清易代文本書寫的代表和縮影，參見張繼瑩，〈祇恐遺珠負九淵：明清易代與《偏關志》書寫〉，《明代研究》，27（臺北，2016.12），頁159-187；林宜蓉，〈不入城之旅：明清之遺民徐枋的身分認同與生命安頓〉，《明代研究》，20（臺北，2013.6），頁59-98
- ¹² 陳永明，〈政治抑壓下的集體記憶——清初張煌言事蹟的傳播〉，《漢學研究》，34：2（臺北，2016.6），頁107-140。

屬未知的鄭芝龍在北京的生活，並主張鄭芝龍在清初的失勢為黨爭之延續；其後的歷史定位亦和之有若干關係。¹³

二、鄭芝龍在京旗籍隸屬與生活

學者對鄭芝龍降清後的旗籍隸屬並不關心，或依據《清史稿》、《欽定皇朝文獻通考》，認為鄭芝龍隸屬正紅旗。¹⁴過去對鄭芝龍旗籍的忽視，意味著無法對處於八旗制度下的鄭芝龍可以有更詳實的理解。實則，鄭芝龍既為旗人，其隸屬與其在北京狀況理應息息相關。本節考證鄭芝龍最初該隸屬多爾袞麾下的正白旗、待多爾袞去世被整肅後，再改隸順治皇帝（1638-1661，1643-1661在位）直屬的正黃旗，最後於順治九年（1652）移入鑲黃旗。過往研究認為鄭芝龍到了北京後過著軟禁般的生活，用以來證明他降清的不智之舉；此觀點來自於鄭芝龍被流放前被軟禁的描述所影響。

清軍入山海關、陷北京、下江南，鑑於南明勢力仍雄，清廷有意識地招撫地方有力軍事掌握者，嘗快速取得尚未歸順地區的統治權。順治二年（1645）六月二十八日清楚地指出幾名重點招撫人物：「前朝世守雲南總兵官、征剿蜀寇督兵官、及吳楚總兵左良玉（1599-1645）、閩廣總兵鄭芝龍等文武官員，若能歸順投誠，則厚加爵位，照舊委任。」¹⁵閏六月時，前明總督洪承疇（生卒年不

¹³ 關於鄭芝龍興起與崇禎年間閩黨失勢間的關聯，可參見Cheng-Heng Lu, "Between Bureaucrats and Bandits: the Rise of Zheng Zhilong and His Organization, the Zheng Ministry (Zheng Bu)," in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Maritime East Asia in World History, 1500-1700*, ed. Tonio Andrade and Xing Ha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pp. 132-155.

¹⁴ 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諸臣封爵世表二〉，《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169，頁5474；清·嵇璜、劉墉等奉敕撰，紀昀等校訂，《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32-63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54，頁7128。鄭克塽改為正紅旗的過程實際上是雍正年間八旗漢軍再編組所致，詳細研究可參見細谷良夫，〈清朝中期八旗漢軍的再編組〉，收入石橋秀雄編，楊寧一、陳濤譯，《清代中國的若干問題》（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頁68-90。

¹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中編，頁110。

詳)擔任招撫江南各省總督軍務大學士,肩負起招撫南方重責大任。¹⁶洪承疇曾在明廷擔任高位,雖然清廷大多時候也會其相當信任、推心置腹,但在招撫江南期間仍受到猜忌,順治四年(1647)函可文字獄發生後,尤其攝政王多爾袞對他充滿懷疑,順治五年(1648)將之招回北京,此後三年直到多爾袞去世,洪承疇都無法一展長才。¹⁷洪承疇與鄭家關係頗為密切,為使招撫效益最大化,在面對鄭芝龍時,派出時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與之有姻親關係的黃熙胤(生卒年不詳,字恭庭)主導。¹⁸順治三年(1646)三月,清方的蘇忠貴(生卒年不詳)抵達福建密會鄭芝龍。鄭芝龍表示唐王(1602-1646, 1645-1646在位)性情暴戾,並且告知曾在隆武朝廷任職但正在廣州的蘇觀生(?-1647)也意圖勸降之;鄭芝龍告知蘇忠貴他欲藉機前往廣東擔任總鎮一職,並奪下廣東以歸附清廷。蘇忠貴將這些消息轉告順治二年閏六月負責南下征剿浙江、福建的征南大將軍博洛(1613-1652)。¹⁹鄭芝龍的明示暗

¹⁶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8,頁162,順治二年閏六月癸巳條;卷75,頁595,順治十年五月庚寅條。關於洪承疇在此時扮演的角色和招撫的策略,可參見王鍾翰,〈洪承疇的歷史功過問題〉,收入王鍾翰,《清史餘考》(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頁147-155。

¹⁷ 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239-248。

¹⁸ 黃熙胤(在清代的紀錄中因避諱而改寫為黃熙允或黃熙孕)出身泉州官宦世家,崇禎四年(1631)進士,其祖父是隆慶二年(1568)榜眼、歷任南京禮部尚書等職務的黃鳳翔。崇禎五年(1632)時擔任南海知縣時,黃熙胤曾整備南海一帶的海防抵抗海盜劉香,與負責追剿劉香的鄭芝龍是同僚關係。雖然過往資料僅提到鄭芝龍和黃熙胤為「姻親」,但並未言明二人的實際關聯。黃熙胤的親戚黃正陞(字淑彥,號亶瞻),為鄭芝龍之婿,在弘光朝時加封同安侯,率軍入衛南京而死。換言之,二者的關聯或許就是因為黃正陞之故。參見清·胡之鏗修,周學曾、尤遜恭等纂,〈選舉志〉,《晉江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0,《中國地方志集成》,第25冊),卷30,頁70;清·史澄等纂,瑞麟,戴肇辰等修,〈職官表三〉,《廣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中國地方志叢書》,第1-2冊,景印光緒五年刊本,光緒四年成書),卷19,頁5-6;清·史澄等纂,瑞麟,戴肇辰等修,〈宦積三〉,《廣州府志》,卷106,頁15;民國·蘇鏡潭纂修,〈人物志之二〉,《南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第28冊,景印民國時期刊本),卷25,頁6;清·王先謙,《東華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十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順治二十,頁28;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75,頁591,順治十年五月乙亥條。

¹⁹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主編,〈黃熙胤題為招撫鄭芝

示，都是希望增加談判的條件，而黃氏家族扮演著重要的中間角色。例如順治三年底博洛進逼福建，鄭芝龍以防範海盜為由，下令撤守仙霞關，此舉動的關鍵目的即是要將功勞歸給這時奉命書寫招募密函的姻親、黃熙胤之堂弟黃徽胤。²⁰該年底鄭芝龍正式降清，與博洛「折刀為誓」，隨後離開福建前往北京——無論是被挾持或自願前往。²¹

鄭芝龍到北京後即被編入八旗，於順治五年八月獲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爵位。²²包括《清史稿》、傳包、傳稿等後修的官方史書

龍情形事本》，《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頁1；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18，頁163，順治二年閏六月癸卯條；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招撫福建黃熙胤題為招撫鄭芝龍情形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1。

²⁰ 明·查繼佐，〈諸臣傳逸〉，《罪惟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21-323冊，景印民國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志32中，頁15；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主編，〈黃熙胤題為招撫鄭芝龍情形事本〉，《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頁1。但另一方面，也持續與清軍交戰；例如順治三年十一月一日，固山額真宗室韓岱率軍攻打興化、泉州等地，即在南安與鄭芝龍、總兵黃京盛所領的軍隊交戰，鄭芝龍退敗；清軍隨後又到泉州與南明軍兩次接戰，隨後又在安海附近擊敗「陳副將」，又回頭與泉州軍隊再次交戰，隨後攻入南安城，接著清軍則分批北上興化、福州等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編，頁322、368。熙胤的堂弟徽胤，字古臣，其父為黃翰中，崇禎十年（1637）進士，後歷任績溪知縣、桐鄉知縣，陞任刑部主事。李自成進京後，熙胤、徽胤二人一同降了李闖政權。清朝入關後再降清；順治元年（1644）七月從刑部主事陞為浙江道監察御史，八月陞為山西巡按，順治三年二月陞任順天巡按，順治六年（1649）四月陞任太僕寺少卿，順治七年（1650）五月再陞為太僕寺卿，十一年八月陞為兵部右侍郎，十二年（1655）三月陞為左侍郎，四月朝廷以「才識平常」勒令其致仕回鄉。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6，頁67，順治元年七月甲午條；卷7，頁81，順治元年八月丙子條；卷24，頁206，順治三年二月丁亥條；卷43，頁347，順治六年四月己亥條；卷49，頁390，順治七年五月戊辰條；卷85，頁671，順治十一年八月丙子條；卷90，頁708，順治十二年三月庚子條；卷91，頁716，順治十二年四月庚辰條；清·胡之錕修，周學曾、尤遜恭等纂，〈選舉志〉，《晉江縣志》，卷30，頁70；明·文秉，《烈皇小識》，臺灣文獻叢刊第26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卷8，頁221。

²¹ 清·談遷，《北游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37冊，景印清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紀聞下，頁384。

²²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40，頁323，順治五年八月壬寅條；卷108，頁850，順治十四年三月乙丑條；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都指出鄭芝龍先隸屬正黃旗，後改隸鑲黃旗。²³然而，這樣的認識是否正確呢？談遷（1594-1658）《北游錄》中稱鄭芝龍：「同入京。賜宅一區。」²⁴清軍入京後，自順治元年就將內城規劃成八個區塊，分賜八旗官員、兵丁，並分別在順治三、五年下令旗民分居並將北京分為內、外城區。²⁵即是說，鄭芝龍抵達北京的時候，正是規範旗籍與民人居住分別的關鍵時期。雖然偶有例外，但是基本上住宅和隸屬旗籍間仍具有密切關聯。²⁶順治十年（1653）五

編輯部主編，〈鄭芝龍題為遵旨招撫事本〉，《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頁3；清·談遷，《北游錄》，紀聞下，頁384-386。其中，《北游錄》為作者談遷在1653年到1656年間在北京的所見所聞，當時的鄭芝龍已經改隸鑲黃旗。

²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逆臣傳〉，《傳稿》（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景印清史館本，統一編號：故傳006388），頁4。

²⁴ 清·談遷，《北游錄》，紀聞下，頁384。

²⁵ 趙寰燾，〈清代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政策的實施及其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8：1（西安，2013.1），頁134-143。

²⁶ 誠然，舉例而言，根據《八旗通志》，鑲黃旗滿洲、漢軍、蒙古都統衙門原設於拐棒衙衙，雍正六年（1728）移到安定門內大街，隔年滿洲衙門移往東直門內大街，乾隆二年（1737）再移往安定門大街交道口等，然而這些區塊都在鑲黃旗境內。正黃旗滿洲、漢軍、蒙古都統衙門，初設石虎衙衙，後來，雍正六年移往德勝門帥府樓衙衙，除了漢軍都統衙門在雍正七年移往西直門，其餘大多在德勝門周圍，也均在正黃旗範圍內；正白旗滿洲、漢軍、蒙古都統衙門，設於煙桶衙衙，雍正四年將滿洲都統衙門移往大佛寺西大街，雍正七年把蒙古與漢軍都統衙門移到東四牌樓報房衙衙，這些區域亦位於正白旗範圍內。正紅旗的各都統衙門則在錦什坊街，後蒙古衙門移往巡捕廳衙衙，此區域應該位於鑲紅旗和正紅旗交界的阜成門附近。鑲白旗諸衙門則是在東單牌樓新開路衙衙，後來在雍正四年移到燈市口、雍正六年移漢軍衙門道東四牌樓大街的燈草衙衙上；這些區域均在鑲白旗境內。又正藍旗諸衙門則在崇文門內大街的西堂子衙衙，並在雍正七年移往本司衙衙，這些亦在正藍旗範圍內。鑲藍旗諸衙門則在宣武門的內塘子衙衙，亦在鑲藍旗範圍內。因此，確實如鑲紅旗滿洲、漢軍、蒙古都統衙門均在雍正六年整合前，就已經位於石駙馬街，該處理論上屬於鑲藍旗區域，然而在《欽定八旗通志》中間頭就特別說明，雍正元年時：「現今八旗並無公所衙門，爾等將官房內揀皇城附近選擇八處立為該管旗官公所。」換言之，在此前，也就是本文所論述的空間與時間，順治、康熙年間衙門與所處位置大致上仍維持盡可能位於各旗範圍內，但是既要在皇城附近、又要屬於官房，且時間已經到了雍正年間北京人口稠密、規範已定，要尋覓符合規定的合適地點就成為難題，也因此才有許多遷移與修正。參見清·鐵保等纂修，〈京城營建規制一〉，《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22-429冊，嘉慶元年成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12，頁9-13。然而，確實住房和旗籍仍有不少例外，例如多爾袞宅邸亦不位於正白旗下，但這也需要考量到是否有足夠龐大的地點可供選擇充作王

月，當時已隸屬鑲黃旗的鄭芝龍奏稱他甫至北京時：「撥入正白旗下，賜屋齊化門小街。」由於此屋破敗，雖然經過重修整建得以居住，但因幾年間，次子鄭世忠（?-1661）、四子鄭世蔭（?-1661）等人陸續先後三次帶家人、婢女、奴僕入京同住後，該宅已超過有一百二十餘人，難以容納。加上該宅後有一大坑洞，鄭芝龍認為「衝陷背脊，大傷風水」，導致數年來宅內共有二十六人去世，堪輿師建言要填妥此坑。然而，工部不批准這項工程，鄭芝龍因而上奏提出兩個方案請求批准：其一、建議再次勘察，並拆除部分屋牆以便回填大坑，重修該宅邸大小共四十八間房間；另一項提案是建議能在當時隸屬的鑲黃旗內，尋覓一間宅邸作為交換。鄭芝龍並仔細地說明，次子鄭世忠目前擔任侍衛，且已娶親，帶著二個幼兒，加上從福建帶來的大小男女五十六人無處安身，希望朝廷能將鑲黃旗境內國子監前兩塊大空地賜給鄭芝龍，由鄭芝龍建造宅邸給福建來的妻兒和鄭世忠一家居住。²⁷換句話說，據鄭芝龍自述，他初到北京後：隸屬正白旗並且居住於齊化門小街上（參見「圖 1」）。

公貴族的宅邸，尤其直到清中葉許多旗人甚至是混居於同一宅院中；參見孔中華、鐘玲、陰劼，〈清代中期北京內城旗人居住狀況的考察與分析——基於乾隆《京城全圖》的研究〉，《滿族研究》，2016：4（瀋陽，2016.12），頁49-55。

²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廂黃旗下正欽尼哈番鄭芝龍揭帖〉，《明清史料》，丁編，第1本，頁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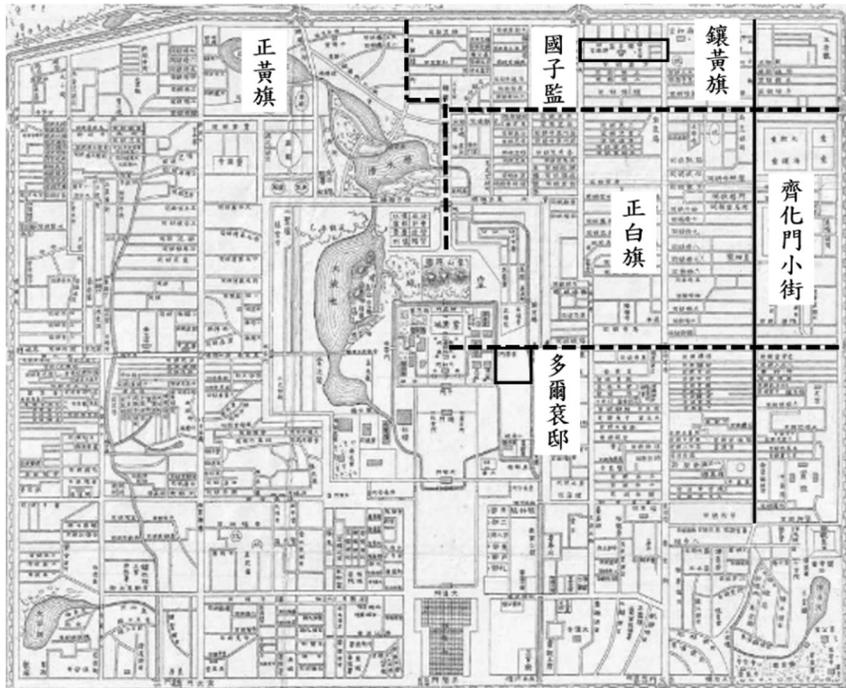


圖 1 鄭芝龍在北京的住宅變遷圖

資料來源：〈精繪北京圖〉，收入《數位方輿》網站。
 〈<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jsp?id=A104000021>〉
 (2024/9/21)。

順治八年（1651）六月時，鄭芝龍在一份〈鄭芝龍題為尊旨招撫事本〉中自稱隸屬正黃旗左夢庚（?-1654）下，²⁸左夢庚在順治五年十月被封為正黃旗固山額真。²⁹然而，順治九年八月時，鄭芝龍改隸要求獲得同意，自此被編入鑲黃旗，其中一項理由即是：「住房在鑲黃旗，而身屬正黃旗，往來未便，懇請改隸旗分等語。」³⁰此後，鄭芝龍始隸屬鑲黃旗劉之源（?-1669）旗下。³¹因

²⁸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主編，〈鄭芝龍題為遵旨招撫事本〉，《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頁3。

²⁹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40，頁323，順治五年十月戊戌條。

³⁰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67，頁521，順治九年八月壬辰條。

³¹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主編，〈噶達洪題為補發勘合護送鄭芝龍家眷來京事本〉，《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頁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廂黃旗下正欽尼哈番鄭芝龍揭帖〉，《明清史料》，丁編，第

此，大約在順治九年八月左右，鄭芝龍住在鑲黃旗的範圍內（約在安定門與東直門間，北京城東北角地區），但隸屬於正黃旗。如此一來，一個矛盾的問題就是為何鄭芝龍初抵北京住在正白旗的齊化門小街，但九年卻又稱住在鑲黃旗範疇內？

整理鄭芝龍關於自身旗籍的，可發現自稱隸屬正黃旗的材料初始於八年六月，此前未有資料展示鄭芝龍隸屬於何旗；然而，自該年二月後的旗籍陳述卻需要被細細思量，因為此時正值多爾袞掌握的正白旗被剝奪並且重新安排，正白旗被納入皇帝管轄內，構成上三旗。³²因此，鄭芝龍的旗籍變化該是在四年降清後直到八年二月，隸屬於多爾袞麾下的正白旗；八年二月順治皇帝整肅多爾袞黨後，正白旗被皇帝收入，鄭芝龍因為被改歸正黃旗，因此才有房舍位於齊化門小街，九年稱住房在鑲黃旗但隸屬正黃旗的狀況出現。除屋舍位置與鄭芝龍自述外，其子鄭世忠之妻隸屬正白旗；考量到當時旗人婚姻須經過呈報，身分特殊者更是如此，由此可知與正白旗之關係。³³

鄭芝龍雖在明末東亞世界聲名鵲起，他對於沿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過去學者通常認為他被挾持到北京後被軟禁在京，這也往往暗示他在北京各面向的無法一展長才。然而通過史料足可證明鄭芝龍即便在北京仍擁有龐大財力。鄭芝龍在北京的主要收入非透過海外貿易，而是透過其他方式，至少就有包括經商、當舖、田產、福建舊業、家族贈禮、放款等收入方式。例如順治十

1本，頁89。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87，頁683-684，順治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條。

³² 鑲黃旗與正黃旗雖然均屬於上三旗，但依照皇太極稱帝後到順治年間，八旗旗幟的順序排列應是：「鑲黃、正黃、正白、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參見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218-222、229、324-334。

³³ 雅賴是努爾哈赤養子扈爾漢之七弟，隨多爾袞入關征戰，並且曾在順治八年間任戶部尚書，隨後罷職；雖然《傳包》說的隱晦，但是這次的罷任理應與多爾袞去世有關係。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覺羅果科列傳〉，《傳稿》（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史館本，檔案統一編號：故傳006074），頁19-21。從這些可知，鄭芝龍很可能與雅賴通過多爾袞所以有所聯繫，因而與其佐領下人聯姻，這點可以應證鄭芝龍與多爾袞的關係，以及鄭芝龍初期隸屬正白旗。

一年，位於南方的鄭成功、黃氏（生卒年不詳）、黃徵明（生卒年不詳）、鄭泰（1612-1663）等人都寫信交由多次往來南北的陳德（生卒年不詳），因為太操勞在杭州病故，恰巧鄭芝龍派在杭州經商的田忠年（生卒年不詳）接手，在十一月初六日將信件送往北京。³⁴換言之，鄭芝龍至少仍派有親信在江南地區經商。此外，同年十一月一批鄭芝龍的親信離開京城後，原定計畫是返回福建，但路途中卻有八人前往蘇州、杭州等地收債。³⁵

鄭芝龍在北京時，麾下往來福建北京的信使或是人員絡繹不絕，往往也會攜帶數量驚人的財貨；即便這時沿途仍是戰雲密布。除了鄭芝龍的房邸外，他在北京龐大的商業與間諜網絡中也涉及不少相關房產。³⁶例如順治十一年四月施琅（1621-1696）之叔、前隆武朝重臣施福（生卒年不詳）曾赴北京拜訪鄭芝龍，當居住於鄭芝龍麾下商人徐月（生卒年不詳）開設於正陽門外的店鋪。³⁷另外，順治十三年二月鄭家的間諜曾在海岱門的一間煙舖接頭。³⁸這些店鋪所在，證明了鄭芝龍在北京擁有一些據點。如鄭鴻逵（1613-1657）曾託信使交給北京鄭芝龍高達銀 2,000 兩、金爵、珀珠、哆囉呢等物。³⁹又，鄭芝龍也曾將數萬銀兩放於徐月店鋪，該處是南北貿易的集散地之一，例如施福造訪帶來燕窩 7 斤、另一人王祺（生卒年不詳）也帶了烟 23 筐在該處販賣並且居住一段時間等待付清款項；鄭芝龍也曾一度急需現銀，因此要管家謝表（生卒年不詳）把白糖、桔餅、沉香等送到徐月店裡急售，因價錢不合適，所以

³⁴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鄭芝龍題為鄭成功復信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81。

³⁵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李際期題為盤獲鄭鴻逵家人李信吳梓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151-154。

³⁶ 有關清初北京城的商業、旗民交產等各方面的研究，可參閱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³⁷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李際期題為議復囚禁鄭芝龍滅其親族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190-193。

³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兵部題本〉，《明清史料》，己編，第3本，頁292-293。

³⁹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李際期題為盤獲鄭鴻逵家人李信吳梓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151-154。

最終又送到當舖去典當換取急錢；因此鄭芝龍的數萬銀兩當是作為貿易的本金和資本。⁴⁰此外，鄭芝龍也在通州開設多家當舖。⁴¹綜合來看，鄭家的人員往來南北、在通州開設當舖、北京開設商鋪、在蘇杭放款，這一切商業活動都是沿著大運河的沿線，由此可知鄭芝龍的商業網絡至少從江南到北京都在運作著。

即便戰爭某種程度上區隔南北，但鄭芝龍在福建仍擁有龐大產業，至少在漳州、泉州還有數萬頃良田。順治十三年四月，巡按福建監理鹽屯事務的監察御史朱克簡經過暗訪，發現鄭家在全閩各府州縣有無數村莊，田租不可勝計。⁴²隔年五月閩浙總督李率泰、福建巡撫劉漢祚奉旨調查福、興、泉、漳四府後，得知鄭芝龍擁有田園、菜地、山林 143 頃 41 畝餘，每年的租糧有 18,656 斛 8 斗餘，應得租稅有銀 853 兩 3 錢餘、牛、糧等折銀為 772 兩 5 錢、耕地折銀有 8,704 兩，⁴³戶部僅將鄭芝龍在閩、浙的房、田、山、海租稅等項造冊，數量高達 25 本之多，還不包含鄭芝龍在京城的家產檔冊。⁴⁴因此，即使當時福建、浙江甚至江南都還處於不穩定的戰爭狀態，這些產業衍生出的財富仍有不少回到鄭芝龍的手上供他運用。

鄭芝龍的財富不僅是維繫優渥生活的重要，更讓他擁有強大

⁴⁰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李際期題為盤獲鄭鴻遠家人李信吳梓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 6 冊，頁 151-154。

⁴¹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孫廷銓題為捉獲鄭芝龍奸細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 6 冊，頁 280-284；安雙成、屈六生主編，〈車克題為將鄭芝龍家人驛送盛京情形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 6 冊，頁 392-402；安雙成、屈六生主編，〈雅布蘭等題為審擬鄭芝龍案內各犯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二）》，第 7 冊，頁 271-275；安雙成、屈六生主編，〈高景等題為審擬鄭芝豹密探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二）》，第 7 冊，頁 298-301。

⁴²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朱克簡題為清查鄭氏家產以資軍餉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 6 冊，頁 315-316。

⁴³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車克等題為清查鄭氏家產以資軍餉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 6 冊，頁 359-360。

⁴⁴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圖海題為清查鄭芝龍原籍家產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二）》，第 7 冊，頁 1。

的經濟後盾在北京的政壇上運作，以及鄭家的諜報網絡之運作。⁴⁵順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都察院左都御史龔鼎孳（1616-1673）參劾浙江福建總督劉清泰時，指出鄭芝龍被作為「以其為楷模，欲勸誘歸順之人，至今十載，豪強日增，鄭芝龍之眾家奴與隨從往來不絕，屢通家信，卻不能訓子革心，又不能束身引咎。進出殿上，近侍皇上，子於上用兵，父在京城高枕無憂，路人亦知其無能。」⁴⁶同日，彈劾鄭芝龍的楊國永（生卒年不詳）更聲稱：「滅鄭成功易，除鄭芝龍難，鄭芝龍一日不除，鄭成功一日難滅」。他認為鄭成功之所以無法被消滅全因鄭芝龍在京城輔佐，並指出：

鄭芝龍揣知聖上之心，縱子乘勢自固，伊借此求榮。鄭芝龍又盡知滿洲刑律事例，故讓家人、親族每月互通財銀，外則推說通商，內則實通密信。凡朝中事務賊均得悉，則可預先籌謀攻守之策。

他特別提到他此次上奏是冒著生命危險，因為鄭芝龍財勢通天，在北京親朋黨羽日多，隨時可以除理掉他這樣一號小人物，乞求皇上速滅鄭芝龍家族。⁴⁷

鄭芝龍的財富驚人的明顯例子體現在他被軟禁的順治十二年；該年十月員外郎孫蘭（生卒年不詳）上奏表示鄭芝龍有德，足可派往「南省充任總督」。由於當時鄭芝龍已成眾矢之的，這樣的推薦無疑引起眾人懷疑，工科博士圖克山（生卒年不詳）認為這可能涉及賄賂等情事，因此建議拿取孫蘭，和碩親王濟爾哈朗（1599-1655）隨即將孫蘭削職拿審。⁴⁸最後審理得知順治十二年時，鄭芝

⁴⁵ 相關論述可參見盧正恆，〈賊諜四出廣招徠：鄭氏諜報網、清帝國初期的東南海島認識與《臺灣略圖》〉，《臺灣史研究》，26：1（臺北，2019.3），頁1-58。

⁴⁶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張秉貞等題為議題參劉清泰並囚禁鄭芝龍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120-121。

⁴⁷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楊國永題為清除鄭芝龍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118-119。

⁴⁸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濟爾噶朗題為孫蘭庇護鄭芝龍是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232-233。此一圖克山或許是1653年進士、滿

龍的管家謝表請託孫蘭上疏保釋鄭芝龍。孫蘭答應後，派管家跟托拜前往謝表岳父張元（生卒年不詳）的家中，與謝表面談。雙方因此談好價錢 3,000 兩，孫蘭果然真的上疏。上疏完成後，謝表和石福（生卒年不詳）分兩批將銀 2,200 兩、金 5 錠折銀 500 兩、多羅絨 1.5 匹折銀 200 兩、緞 10 匹折銀 100 兩。之後孫蘭宴請石福一次，孫蘭也派管家會見被囚禁的鄭芝龍，受到賞銀 2 兩。由於作實收受賄賂，孫蘭雖然逃過抄家，但被判了監候秋斬。⁴⁹之後鄭芝龍與其家人親屬均流放，直到順治十八年（1661）六月，因為寧古塔官田男丁有缺，因此清廷在七月下令將十四年被流放到盛京的鄭芝龍家口共計：鄭芝龍下男丁 54、婦女 51、男孩 36、女孩 25；鄭芝豹（生卒年不詳）下男丁 25、婦女 6、男孩 5；鄭世忠下男丁 8、婦女 2、男孩 2；鄭世恩（生卒年不詳）下男丁 8、婦女 2。除鄭芝豹麾下的 36 名男女外留在盛京屯著外，其餘共計 188 人均移往寧古塔。⁵⁰因此，至少我們知道鄭芝龍在北京的所有家人至少有超過 200 人。順治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因為鄭成功不願意投降持續抵抗的心態已愈趨明朗，朝廷決議將鄭芝龍斬首後示眾於福建。⁵¹

簡言之，鄭芝龍投降後隸屬於多爾袞的正白旗麾下，並且住在齊化門；當時隨鄭芝龍降清的部下多分散於其他旗籍下，或許是避免鄭芝龍在旗內培植自己的勢力。例如，南明杉關守將陳秀（生卒年不詳），歷屬正黃旗，世襲阿達哈哈番。⁵²另一人是龍溪人

洲正白旗人，順治任他赤哈哈番，康熙年間曾以戶部郎中任山西布政使的圖克善（屠克善、土克善），參見清·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 90，頁 711，順治十二年三月甲辰條；馬齊等修，《清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42，頁 568，康熙十二年七月丙申條；卷 63，頁 816，康熙十五年十月乙丑條。

⁴⁹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多尼題為詳審孫蘭庇護鄭芝龍一案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 6 冊，頁 295-298。

⁵⁰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車克等題為鄭芝龍家族由盛京遷往寧古塔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二）》，第 7 冊，頁 199-200。

⁵¹ 雖然鄭芝豹與他的孩子們林關、遙關、溶關都被判處斬殺。但鄭芝豹因為鄭成功反叛前就已經投降了，他的兒子們免去死罪。參見安雙成、屈六生主編，〈岳洛等題為擬斬鄭芝龍及其子孫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二）》，第 7 冊，頁 275-276。

⁵² 清·郝玉麟等監修，謝道承等編纂，〈封爵〉，《福建通志》，《景印文淵閣四

郭燿（生卒年不詳），隸屬鑲藍旗、爵位為輕車都尉。⁵³順治七年底多爾袞去世、緊接著被清算後，正白旗被收歸皇帝直轄，鄭芝龍被移入順治皇帝麾下的正黃旗，並在1652年以住所不足和不方便為理由，奏請遷移到鑲黃旗下。此外，鄭芝龍遍佈中國的產業，即使他已經沒有實質管控海外產業的控制權，但單單在北京、江南、福建的事業就已經提供了他強大的經濟後盾；即便在當時烽火遍地，南北遞送貨物和通信的商人往來不絕。他們同時肩負起了傳遞情報的工作，但同一時間也是負責經商者。鄭芝龍的雄厚經濟實力，讓他可以在北京過上相當不錯的日子，也可以讓他擁有政治資本收買官員，培植實力。然而，經濟能力還是無法抵擋壞運降臨，政治上的角力讓鄭芝龍被迫陷入清初政治場的一系列黨爭上。

三、多爾袞去世、黨爭與黃道周友、徒之撻伐

過去批判鄭芝龍降清者多認為他放棄仰賴海洋的大本營實屬不智之舉；然而，若是將他到北京後歸屬多爾袞旗下，且依舊能夠維繫經濟能力看來，此一決定並非不恰當。實際上，當順治四年鄭芝龍投降時，正值壯年、位高權重的多爾袞權傾朝野，大有萬人之上而未有一人之下的態勢；沒人會預料到他會在順治七年底驟逝，恐怕也無人會猜到多爾袞去世後緊接著來到的整肅與政治鬥爭會如此猛烈、迅速，並帶給大清歷史和政局震撼改變。既然鄭芝龍降清之初隸屬多爾袞的正白旗，本節將論述多爾袞之死與隨後的黨爭將鄭芝龍被動地嵌入，成為最終處置、流放他的主因之一。

庫全書》，第285-288冊，乾隆四十一年成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7，頁17；清·陳鏜，王作霖，蔡廷推，鄧來祚纂修，〈人物志國朝列傳〉，《海澄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0年，《中國地方志集成》，第30冊，景印乾隆二十七年刻本，乾隆二十五年成書），卷13，頁3；民國·林學增修，吳錫璜纂，〈鄉賢錄〉，《同安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第4冊，景印民國十八年刻本（上海：上海書店，2000），卷28，頁38。

⁵³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主編，〈孫廷銓題為議復揚國永自薦赴海招撫及薦舉郭曦事本〉，《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頁243-244。

皇太極（1592-1643，1626-1643 在位）去世後，年幼的福臨即位為帝，當時由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睿親王多爾袞共同攝政。不過，雖說《清史稿》稱順治二年睿親王已經「擅政」，⁵⁴但到四年七月前濟爾哈朗已經被停罷輔政一職，⁵⁵五年三月濟爾哈朗被降為多羅郡王，並且雖然在閏四月恢復原爵，但該年九月就已命為定遠大將軍離京征戰湖廣；因此可以知曉，在鄭芝龍投降的當下，雖然多爾袞主導朝廷運作，但大概要等到隨後競爭對手逐一消失才完全控制政局。⁵⁶國史院、秘書院、弘文院的大學士和六部官員幾乎均與多爾袞親近。不過，與此同時與多爾袞立場相左的官員亦已經結黨，形成一股勢力，雖然在多爾袞去世前受到壓制或是隱忍不發。多爾袞去世後，曾經「隸睿親王多爾袞屬下」的蘇克薩哈（?-1667）與王府護衛詹岱（生卒年不詳）指出多爾袞的逆狀，致使八年多爾袞被剝奪封號。⁵⁷此後，英親王阿濟格（1605-1651）試圖延續多爾袞之權，但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為首的官員逮捕阿濟格並且針對過往親近多爾袞的官員進行整肅。⁵⁸

雖然目前受限於史料，以至於在順治初期鄭芝龍在京城與多爾袞之關係仍舊不清楚，但至少多爾袞或多或少在某程度上介入、參加這次的招撫。根據多爾袞去世後的三份材料，可以發現多爾袞對鄭芝龍曾經「嚴加看管」——此看管可以有二種解釋，一種是軟禁與監視、另一種則是出於保護作用的納入麾下。首先，順治皇帝於順治九年十月給浙江福建總督的一份敕諭中，提到鄭成功不投降是因為仍有疑慮，由於鄭芝龍到了北京後被墨勒

⁵⁴ 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列傳三十六〉，《清史稿》，卷249，頁9673。

⁵⁵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33，頁270，順治四年七月乙巳條。

⁵⁶ 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世祖本紀一〉，《清史稿》，卷4，頁110-112。

⁵⁷ 值得一提的是，《海上見聞錄》中提到蘇克薩哈與鄭芝龍有嫌隙，因此在順治十八年十月下令殺鄭芝龍，這樣的嫌隙是否因為二人曾在多爾袞手下時所產生，又或者是蘇克薩哈清除過去睿王追隨者的行為則無法得知。參見清·阮旻錫，《海上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卷2，頁39。

⁵⁸ 相關研究可以參見鴛淵一，〈清朝順治初世の派閥的抗争に就いて：特に睿王派の結成について〉，《人文研究》，9：11（大阪，1958），頁1222-1243。

根王令人看守防範，又不計在籍親人的恩養和安插。順治皇帝讚賞鄭芝龍久經歸順、其子弟都是「我朝赤子」。⁵⁹鄭芝龍為了表達自己的效忠，在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時還稱自稱「竊思皇上親政以來，臣受皇恩甚重，念及睿王時，即如出深淵而步入九天。」⁶⁰相類似的描繪在敕諭鄭成功的文件中也有呈現，順治皇帝給予鄭成功的信件中曾提到：「爾父為貝勒所給屈抑數年，爾父在墨勒根王時，果有猜疑看守之事。朕親政以來，優厚大臣，加陞爾父官爵同舊人飲食於前列恩禮罔間，想爾亦已悉知之。」⁶¹此外，順治十年十一月給予「靖海將軍海澄公鄭成功」的敕諭中提到：

爾鄭成功乃我朝世襲同安侯鄭芝龍之子，曩者大軍下閩，芝龍首倡來歸，雖經敘錄，未稱厥功，緣睿王疑心輕聽，不計週全恩養，以致爾疑懼淹留，跡寄海中，情甘化外。⁶²

可知當時朝廷的共識是將鄭成功無法歸順一事，歸咎於此時已被整肅奪爵的睿親王多爾袞身上。即使這也可能是怪罪於已死的眾矢之的的手段，但或可說明鄭芝龍是受到多爾袞特別看管和監視。然而，倘若鄭芝龍並未被善待、甚至遭到忽略或是猜忌看守，難以想像他仍能維持前述那樣規模龐大的經濟活動與政治活動。由於三份材料都出現在多爾袞去世且被整肅後，清廷把無法招撫鄭成功和輕忽鄭芝龍的責任歸咎於已死且成為眾矢之的的多爾袞無疑是個好方法。誠然，即使鄭芝龍曾經隸屬正白旗、擁有

⁵⁹ 原先寫著「我朝之人」，但隨後被修正為「我朝赤子」；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敕諭浙江福建總督劉清泰密稿〉，《明清史料》，丁編，第1本，頁67。

⁶⁰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濟爾噶朗等題為勸降鄭成功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56。

⁶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敕諭鄭成功稿〉，《明清史料》，丁編，第1本，頁91-92。

⁶²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79，頁621，順治十年十一月戊戌條。該敕諭之擬稿寫於該年五月，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擬海澄公動稿〉，《明清史料》，丁編，第1本，頁87。

相對自由的活動、多爾袞曾對其有特別對待，都還是無法證實鄭芝龍和多爾袞之間的關係。以下將從更多角度探索鄭芝龍與多爾袞麾下部屬、親信的關係。

其中一位關鍵人物是陳名夏（1605-1654）。除了前述的洪承疇與黃熙胤等人外，鄭芝龍在北京的另一個依靠可能是前東林黨人復社成員、官居大學士、同樣是多爾袞延攬到朝廷的陳名夏，也是順治時期南北黨爭的關鍵人物。陳名夏與負責招撫福建的黃熙胤及其子黃志遴（生卒年不詳，字銓士）均為好友，黃熙胤生日之時，黃志遴也請陳名夏作序賀之。⁶³此外，陳名夏嘗替其好友、隨鄭芝龍北降的黃正陞（生卒年不詳，號宣瞻）所寫之詩寫序；⁶⁴既然鄭芝龍為黃熙胤所招撫、陳名夏和親家黃熙胤及自己已故的女婿黃正陞相友好，因而鄭芝龍和陳名夏肯定認識。甚至陳名夏與洪承疇、黃徽胤等關係密切，均曾是火神廟事件中聚集商議者。⁶⁵

陳名夏在順治元年十二月受保定巡撫王文奎（1598-1654）推薦，在次年正月以原官翰林院修撰起用，二月進而擔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該年七月，以明末閹黨馮銓（1595-1672）、孫之獬（1591-1647）為主體的北黨被舊東林黨人龔鼎孳等彈劾。雖然多爾袞最終支持他提拔的閹黨馮銓、申斥龔鼎孳等，但多爾袞並未涉入明末黨爭的偏見，因為他同樣支持提拔的陳名夏。順治五年七月，清廷設六部漢尚書時，任命陳名夏為吏部尚書，隔年十月更加太子太保，成為朝中位階最高的漢人朝臣之一。陳名夏與同樣掌管銓選職掌的吏部滿尚書譚泰（1593-1651）關係密切，一滿一漢均為多爾袞提拔之臣，可謂掌握當時朝廷的任命和升遷之權；相較於陳名夏，馮銓並沒有獲得特別的權力和作為。即便多爾袞去世、經歷火神廟事件後，陳名夏在八年七月仍進一步成為

⁶³ 明·陳名夏，〈黃恭庭序〉，《石雲居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冊，景印順治年間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2，頁11-12。

⁶⁴ 明·陳名夏，〈黃宣瞻詩序〉，《石雲居文集》，卷2，頁24-25。

⁶⁵ 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252-255。順治八年五月，張煊指出洪承疇、陳之遴、陳名夏等人曾在火神廟商議叛逃一事，參見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62，頁485，順治九年正月壬午條。

弘文院大學士；但同年，河南道監察御史張煊（?-1651）彈劾之，待譚泰獲罪被殺後，陳名夏亦隨後在隔年正月遭到革職，發入「正黃旗漢軍下」；某種程度即是被管理監視。順治十年正月，陳名夏再次出任秘書院大學士、任吏部尚書。⁶⁶順治十一年三月，陳名夏又被寧完我（?-1665）和馮銓，十二項大罪所劾，陳名夏遭籍沒家產充公、被處以絞刑，家人流放盛京；但馮銓卻因而進入內閣。⁶⁷據上所述，陳名夏既是被多爾袞納入清廷統治階層，又與譚泰相友好，多爾袞曾力保馮銓卻不見對馮銓有積極的提拔，相較之下對於陳名夏的提拔更顯而易見；而鄭芝龍與陳名夏等「東林黨」相交好，又先後隸屬於多爾袞的正白旗和譚泰統管的正黃旗，因而大概可知曉鄭芝龍在「黨爭」中選（或被迫）站的派別，上述證據也加強了多爾袞支持鄭芝龍的可能性。

黨爭過程中，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則是額駙揚古利（1572-1637）的堂弟譚泰，庫爾喀部舒穆祿氏，他也是被皇太極拔擢為正黃旗固山額真。⁶⁸譚泰與多爾袞關係良好，曾因罪而獲多爾袞援救，並在天聰到順治年間3次掌管正黃旗。順治八年多爾袞被整肅後，一度成為北京政治中樞。⁶⁹順治七年十二月，多爾袞逝世，隔年在鄭親王濟爾哈朗等人彈劾下，原先被迫為成宗的多爾袞被整肅，其黨羽多被論死。雖然正黃旗固山額真譚泰與多爾袞關係密切，但

⁶⁶ 參見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12，頁117，順治元年十二月甲戌條；卷13，頁123，順治二年正月壬子條；卷14，頁125，順治二年二月丙辰條；卷39，頁314，順治五年七月丁丑條；卷46，頁370，順治六年十月丙申條；卷58，頁462，順治八年七月己亥條；卷62，頁485，順治九年正月壬午條；卷71，頁562，順治十年正月丁丑條；卷74，頁586，順治十年四月乙卯條。

⁶⁷ 參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頁89-90；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列傳三十二〉，《清史稿》，卷245，頁9635；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82，頁640-645，順治十一年三月辛卯條；有學者認為陳名夏、譚泰等人的失勢實際上是順治皇帝和議政王集團之間競爭的表現，參見王于飛，〈陳名夏之死與順治改制內幕〉，《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科版》，25：7（成都，2004），頁458-463。

⁶⁸ 蕭一山，〈多爾袞之攝政〉，《清代通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62），卷上，頁381；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頁149-204。

⁶⁹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23，頁199-200；蕭一山，〈福臨親政後之建施〉，《清代通史》，卷上，頁386。

他因為勢力龐大，第一時間未被整肅，甚至得以力保陳名夏不被處斬。順治八年底，譚泰被告發結黨營私，被論罪處斬，正黃旗交到他族侄、與多爾袞不合的伊爾德（?-1661，或作宜爾德）身上。⁷⁰伊爾德為滿洲正黃旗人，揚古利族姪，自天聰三年（1629）起即隨軍征戰無數。順治三年二月陞為正黃旗護軍都統，五月陞為二等昂邦章京，七年五月因平南有功再陞為一等精奇尼哈番，之後在七月到隔年八月間，與鰲拜（生卒年不詳）發生衝突，一度論死，但八年十月陞為正黃旗固山額真。⁷¹九年七月隨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生卒年不詳）出征湖南的永曆朝廷的孫可望（?-1660），但十一月尼堪戰死，⁷²十一年十月返京革職除籍；十二年正月伊爾德被重新起用，恢復一切身分，並於年底封寧海大將軍，出征舟山。⁷³

結合前述鄭芝龍旗籍考證，可發現一些巧合。鄭芝龍提出改隸要求恰巧是多爾袞黨失勢、大學士陳名夏、正黃旗固山額真譚泰死；繼任的固山額真伊爾德雖與譚泰同族，但其與多爾袞政治理念並不相同，此時舒穆祿氏中以愛星阿（生卒年不詳）、伊爾德為首，均是從前與多爾袞政爭下的失敗方。即使正黃旗直屬皇帝，但包括伊爾德等人仍在正黃旗下，或許因此要求移往鑲黃旗這一舉動成了首要任務。鄭芝龍更可仰賴的不再是權臣親貴，而是漸漸握住主權的順治皇帝；因此，在鄭芝龍改旗到鑲黃旗後，開始有較多記錄顯示他前往南苑、海子，伺候御前、「近侍皇上」。⁷⁴

⁷⁰ 相較於此，出自同一家族的伊爾德卻與多爾袞針鋒相對，曾經在多爾袞欲彈劾鰲拜時，因伊爾德不願作證而將之判罪。參見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49，頁394-395，順治七年七月丙寅條。

⁷¹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24，頁204，順治三年二月甲申條；卷26，頁219，順治三年五月己未條；卷49，頁390，順治七年五月丙辰條；卷59，頁468，順治八年八月甲子條；卷61，頁481，順治八年十一月戊戌條。

⁷²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66，頁516，順治九年七月甲申條；卷70，頁551，順治九年十一月辛卯條。

⁷³ 清·鐵保等纂修，〈大臣傳十四〉，《欽定八旗通志》，第422-429冊，卷148，頁16-20。

⁷⁴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李率泰題為鄭軍攻取饒平直抵廣州附近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102；安雙成、屈六生主編，〈鄭芝龍題為鄭世忠等勸降鄭成功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

順治十一年六月十八日鄭芝龍被授予內大臣爵，並且「視為親信」，同時他也獲得親王和首輔大臣的會議赦免無罪。⁷⁵ 甚至到順治十四年（1657）七月，兵部尚書覺羅伊圖（?-1677）上奏請斬鄭芝龍，而其奏本之後交由議政王、貝勒、大臣等商議後，隔月，多羅信郡王多尼（1636-1661）依覺羅伊圖的原本，上奏請將鄭芝龍正法，提到皇上似乎仍有意相信並派鄭芝龍親赴海上招撫鄭成功，並且意識到順治皇帝很可能不願將鄭芝龍處死，僅赦免將之發往寧古塔。⁷⁶

綜上所述，發現鄭芝龍改旗和被彈劾的時間點有相當高的重疊性，正是面臨靠山接續倒臺。即使鄭芝龍長袖善舞，他主動或被動試著把自己放到最安全的位置下，卻一一失敗。從四年降清後被納入多爾袞的正白旗，與此同時他有密切姻親關係的黃熙胤和陳名夏等人也同是多爾袞招撫來的重臣，也包括時任正黃旗固山額真的譚泰。然而，七年底多爾袞去世後，八年多爾袞與他的黨羽被清理後，鄭芝龍同時改入正黃旗；該年年底，譚泰被處死；九年，陳名夏失勢罰入正黃旗，鄭芝龍隨即於幾個月後提議移至鑲黃旗。此後，陳名夏於十年恢復官位，但於次年被殺；到了十一年底到隔年年初，當伊爾德重獲權力的同時，批評與彈劾鄭芝龍也恰巧同時出現，或可稱鄭芝龍在連串靠山接連倒臺後，「樹倒猢猻散」的最佳寫照（參見「圖 2」）。

6冊，頁106-107；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楊國永題為清除鄭芝龍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118-11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兵部題本〉，《明清史料》，己編，第3本，頁292-293。

⁷⁵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濟爾噶朗等題為勸降鄭成功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57。內大臣屬於侍衛處，主要工作是在皇帝身邊服務，參見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職官四〉，《清史稿》，卷117，頁3364-3365。

⁷⁶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伊圖等題為處決鄭芝龍、鄭芝豹等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382-384；安雙成、屈六生主編，〈多尼題為正法鄭芝龍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404-4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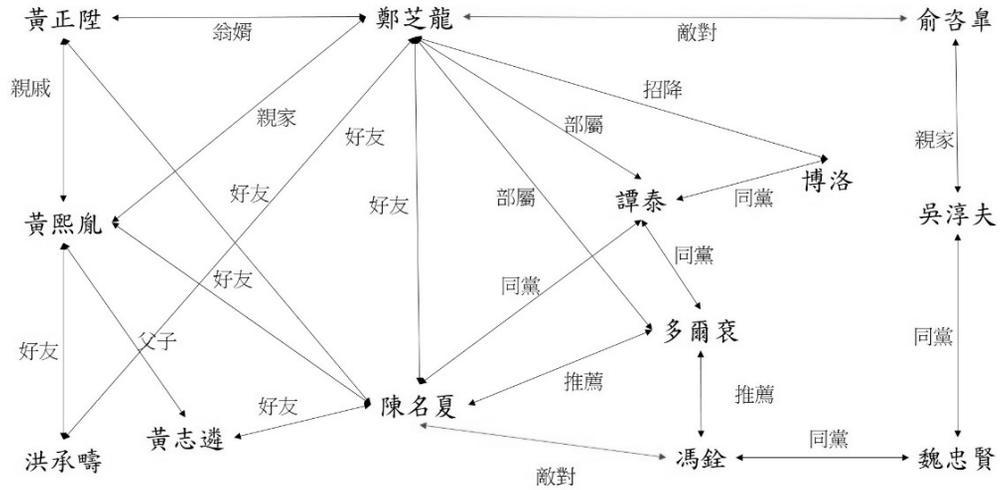


圖 2 鄭芝龍人際關係圖

資料說明：俞咨臯為俞大猷之子，天啟年間與閩黨中五虎吳淳夫交好並為親家，雙方關係緊密。魏忠賢倒台後，五虎被親算時吳淳夫罪刑之一就是與俞咨臯狼狽為奸。

資料來源：Cheng-heng Lu, "Between Bureaucrats and Bandits: The Rise of Zheng Zhilong and His Organization, the Zheng Ministry (Zheng Bu)," pp. 134-136.

因此，鄭芝龍的旗籍改變和他在北京仰賴的團體有著密切的關係。願意離開海洋或許是認識到清廷中會有攝政王多爾袞和洪承疇作為靠山，到了北京也確實被撥入正白旗下。這樣的日子並未隨著多爾袞去世而消逝，因為他還有譚泰、陳名夏二位掌握政治核心的權臣可以照應，莫約此時候他編入正黃旗，隸屬譚泰麾下。但是，這段時間的政爭變化太快，譚泰在八年年底被論處；接替正黃旗固山的人是伊爾德，鄭芝龍旋即在隔年要求移入鑲黃旗，因為這時能保障他的滿人似乎僅有順治皇帝了，漢人重臣方面雖然有陳名夏，但他並非權傾朝野的人物、更陷入黨爭，因此在十一年陳名夏被處後，洪承疇也已不在北京城內，更無論黃熙胤等人並非有實際政治權力的大官，鄭芝龍幾乎喪失原有的所有網絡了。

四、黃道周之死：政爭外的私仇與歷史書寫

過往，除了與「忠孝楷模」鄭成功形成強烈對比外，鄭芝龍最常被歸咎的一項不道德之舉即是他對於隆武朝廷的態度，又可體現在「導致」一代鴻儒黃道周戰敗被擄、最後被殺。這類的討論往往指出鄭芝龍不願提供資源給黃道周，導致他出師無法獲得後勤支援，因此兵敗被俘，最終被處斬。黃道周是一位影響深遠的大儒，好友徒子滿天下，其死無論是在明或在清者均展現出豐厚的殤感情緒。易代時期，忠、孝概念在「悼亡」作品中的角色往往隨著不同的身分有所差異，例如許明德試著明清鼎革中，不同社會組成與身分，文人們產生不同的的悼亡紀念和評價。⁷⁷明清鼎革中，頗受關注即是大儒黃道周之死，認為隆武朝廷和他均受鄭芝龍專權所害，學者對其死下了如下註解：「他殺身成仁不違其素的壯烈犧牲，為提倡理學講求正心修身發揚氣節的明朝，做了神聖的總結。」⁷⁸在「悼亡」意念下，文人通過史學或是文字描述建構出來的歷史記憶與解釋，往往闡述了書寫者對於逝者的追憶，甚至情感之展現——有時也會是宣洩情緒之處。本節將通過人脈網絡的狀況，試圖還原一個將怨懟寄寓於書寫和黨爭牽連者的結果；亦即是，一種情感和實際狀況間的結合。

現存彈劾鄭芝龍相關文件的書寫者，幾乎都與黃道周有某種程度的關係。彈劾鄭芝龍的聲浪在順治十二年正月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生卒年不詳）建議清除鄭芝龍等內奸。數天後，漳州人降將楊國永也同樣上奏要求清除鄭芝龍。⁷⁹同月，兵部尚書張秉貞（?-1655）、都察院左都御史龔鼎孳共同要求

⁷⁷ 許明德，〈明清之際夏允彝之死及其相關悼念詩文之敘事策略〉，《漢學研究》，32：4（臺北，2014.12），頁167-191。

⁷⁸ 吳秀玉，〈南明殉節大儒黃道周學說之時代地位〉，《宜蘭大學學報》，2（宜蘭，2004），頁120。

⁷⁹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主編，〈彭長庚題為清除鄭芝龍事本〉，《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頁87；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主編，〈楊國永題為清除鄭芝龍事本〉，《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頁90-92。

將鄭芝龍和其妻小遷居，並處罰招撫鄭成功辦事不利的浙閩總督劉清泰。⁸⁰除了彭長庚外，如張秉貞、龔鼎孳等幾乎都和黃道周有非常直接且密切的關係。甚至如接替譚泰作為正黃旗固山額真的伊爾德於順治十三年受封寧海大將軍出征舟山時，隨軍的幕僚有一中書舍人名為宋徵璧（1602-1672）。⁸¹宋徵璧，松江人，與黃道周關係密切，與陳子龍（1608-1647）一同編纂《明經世文集》，其編之文約占十之二，順治十一年正月由陳名夏政敵——馮銓上疏推薦拔擢時任中書舍人的宋徵璧以及未任官的吳偉業（1609-1672）等人。⁸²吳偉業同樣是黃道周的學生，並且與龔鼎孳為好友。⁸³黃道周亦是陳子龍的座師。⁸⁴另一位正白旗的漳州人楊國永是順治元年十月十七日時，弘光朝廷派遣從南京運糧北上者，之後要求留在北京、編入旗下。⁸⁵由於在當時弘光朝廷的策略是「聯虜剿寇」，因此朝中許多人都支持運糧北上支援如吳三桂（1612-1678）或是清廷，也包括了時任職兵科的陳子龍，他建議「款虜剿寇」。⁸⁶若是當時楊國永從在南京啟程，陳子龍即是他運糧北上的上司之一。與龔鼎孳一同上奏的張秉貞（1607-1655），亦與黃道周長年書信往來。⁸⁷此外，宋徵璧的堂弟名為宋徵輿（1617-1667），

⁸⁰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主編，〈張秉貞等題為議參劉清泰並囚禁鄭芝龍事本〉，《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頁92-94。

⁸¹ 陳乃乾、陳洙纂輯，《徐聞公先生年譜》，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4冊，景印民國十五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32。

⁸²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80，頁629，順治十一年正月庚子條。

⁸³ 清·吳偉業，〈壽總憲龔公芝麓〉，《梅村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1冊，康熙七年成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5，頁11-12。此外，吳偉業曾於順治十二年作詩〈壽總憲龔公芝麓〉贈龔鼎孳，祝賀其四十歲生日；參見清·吳偉業，〈壽總憲龔公芝麓〉，《梅村家藏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96冊，景印宣統三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35，頁1-2。

⁸⁴ 明·陳子龍，〈遊大滌山記〉，《安雅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明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7，頁10。

⁸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編，頁58。

⁸⁶ 參見顧誠，《南明史》，頁88-127。

⁸⁷ 明·黃道周，〈與張元之書〉，《黃漳浦集》，《叢書集成》（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三編，第52-53冊，卷15，頁23。張秉貞為桐城人，崇禎四年進

也是與陳子龍、李雯（1607-1647）並稱為「雲間三子」。⁸⁸宋徵璧、徐孚遠（1599-1665）、陳子龍、夏允彝（?-1645）等人均為幾社成員。因此，屬於伊爾德幕僚的宋徵璧；受到與陳名夏為反對黨派的馮銓推薦的吳偉業，上奏彈劾鄭芝龍的龔鼎孳、張秉貞、楊國永等關聯中最大的交集即是曾為隆武朝文臣第一把交椅的黃道周。

大學士陳名夏被劾而死，永曆政權在西南地區的反攻，以及十一年十二月漳州城被鄭成功攻陷等事件，⁸⁹促使黃道周的同鄉、與黃道周學生友善、又曾與鄭芝龍同屬正白旗的漳州人楊國永，率先在清廷準備正式看待鄭芝龍問題時發難，靠著鄭芝龍舊部郭燿得來的資訊，攻訐鄭芝龍。⁹⁰同一時間，以龔鼎孳為首的黃道周好友們，以及朝中對鄭芝龍不滿的大臣紛紛群起攻擊，而龔鼎孳等人更有著朝中滿臣，甫復官還籍的伊爾德為靠山。順治十四年三月多尼上奏，引述甫被封為海澄公的黃梧（1618-1674）之言，告知鄭芝龍在京中屢屢賄賂，假借招撫之名而與鄭成功聯絡，導致

士，明代時官至浙江巡撫，清軍攻入南京後，六月在杭州與潞王一同降清，歷任禮部郎中、通政使司參議等職，十年二月陞為兵部左侍郎，四月時因涉及任珍案一度論處革職，但後來朝廷僅處罰了陳名夏等少數人，五月時卻從兵部左侍郎陞為刑部尚書，十一年八月更陞為兵部尚書。參見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卷19，頁167，順治二年七月壬子條；卷49，頁392，順治七年六月丁酉條；卷74，頁582-583，順治十年四月甲辰條；卷75，頁596，順治十年五月壬辰條；卷85，頁673，順治十一年八月丙子條；清·傅恒等修，〈明唐桂二王本末〉，《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3-97冊，乾隆三十三年成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17，頁2。

⁸⁸ 宋徵與在福建時主持順治八年的鄉試及武舉考試，而在前往福建時途經隆武帝戰死之處，還經過作詩二首。參見清·宋壁與，〈七言律詩〉，《林屋詩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8冊，景印康熙年間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10，頁1-3。

⁸⁹ 關於「鄭部」的討論，可參見 Cheng-Heng Lu, "Between Bureaucrats and Bandits: the Rise of Zheng Zhilong and His Organization, the Zheng Ministry (Zheng Bu)," pp. 132-155.

⁹⁰ 郭燿為鄭芝龍身邊大將，自明末已經跟隨鄭芝龍四處征戰，順治三年隨鄭芝龍一齊降清，後來成為壓垮鄭芝龍的其中一根稻草。參見安雙成、屈六生主編，〈孫廷銓題為議復楊國永自薦赴海招撫及薦舉郭曦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312-314。

鄭成功因此仍公然在東南地區活動如故，並稱此時鄭芝龍已經被上鐵索囚禁。⁹¹順治十二年，隨著實際政治局勢下鄭芝龍成為黨爭中的一個小角色，但與此同時歷史書寫、評價與敘事逐漸誕生，其中一項關於黃道周之死的歷史記憶進一步如影隨形。

黃道周之死為鄭芝龍所害不僅是現代學者所持之意見，在清代就已是普遍存在的論述，例如清中葉文人程恩澤（1785-1837）曾作詩中就有：「石齋募師死於飛黃。」⁹²此外嘉慶九年（1804），後人補述吳偉業所著的《鹿樵紀聞》中也嘗稱：

黃道周憤鄭氏偷安，聞江西紳士傅鼎銓（1611-1651）、萬元吉（1603-1646）、楊廷麟（?-1646）等所在團結為明守，自請視師。芝龍不與一兵；道周出關，召募得千餘人，行至衢州，為其門人所誘，執送江寧，死之。⁹³

由此可知這樣的歸咎來自於「鄭芝龍不與一兵」導致其死亡至少在清中葉已經廣為流傳；然而，這樣論述的源於何時呢？又是如何被建構的呢？

當隆武立於福建時，黃道周另外一位好友黃景昉（1596-1662）奉召入閣，並寫下了〈蒙遣官齋勅召不赴難自明書用寫歎〉論及此事，當中有詩句：「三山國勢漸非尊，建武風規若箇存，兩鎮守關兵玩法，一家當國眾移恩。」頗有指桑罵槐之感。⁹⁴此處的三山指位於福州的隆武朝廷，兩鎮指當時奉命兩路出兵的鄭鴻逵、鄭彩（生卒年不詳），而「一家當國」自然是指鄭家當權。此後詩句又有提到：「人才誰復過銅官，赤手空卷擯出關，遂令傳經伏不

⁹¹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多尼題為黃梧密陳剿滅鄭軍並正法鄭芝龍事本〉，《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第6冊，頁348-352。

⁹² 清·程恩澤，〈神魚井懷古〉，《程侍郎遺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咸豐五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6，頁7。

⁹³ 清·梅村野史，〈唐王〉，《鹿樵紀聞》，臺灣文獻叢刊第12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卷中，頁54。

⁹⁴ 明·黃景昉，〈蒙遣官齋勅召不赴難自明書用寫歎〉，《甌安館詩集》，景印明刊本（東京：高橋寫真館，1990），卷6，頁4。

鬪，翻成罵賊顏常山。」⁹⁵「銅官」引申為銅山人黃道周，他率軍出關後死節，黃景昉則將之比喻成漢代因欲暗殺曹操（155-220）而被滿門抄斬的伏完（生卒年不詳）家族，又以唐代罵安祿山而死的顏杲卿；二者的共同特色就是都是挑戰當時的權臣武將。

隆武政權滅亡後，黃景昉也曾寫下〈三山紀事〉四首，其中就有提到：「建康難得駐，何況入閩中。」藉此表達對於隆武朝廷註定不可成功的想法。⁹⁶厭惡鄭芝龍與鄭家弄權的黃景昉，並未出仕、也沒有任何需要婉轉的指責鄭芝龍的動機，倘若真需要直指鄭芝龍應當負責黃道周之死，理應可明言，但在黃道周被斬後，景昉做了五首〈哭黃石齋先生〉，詩中將黃道周譽為文天祥（1236-1283），但是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指責鄭芝龍的語句存在。⁹⁷由此可知，即使厭惡鄭芝龍如黃景昉一般，對於黃道周出征而死之事，也未曾將之歸咎於鄭芝龍甚至並未說到二人之間的不睦。以上，可以發現在鄭芝龍「垮臺」前，相關的文獻幾乎從未將黃道周和鄭芝龍進行任何的連結，唯一的聯繫則是批評鄭芝龍弄權於隆武朝廷。即是鄭芝龍降清前，南明官員或明遺民確實已看出鄭芝龍的驕縱跋扈。

首先須認識黃道周此次出兵的狀況。據載，黃道周與鄭鴻逵一起北伐，但鄭鴻逵不願繼續前進；因為隆武朝廷經濟拮据而無法獲得充分的兵源和軍餉，黃道周僅能自行募兵、籌糧，出兵江西、北上徽州，但兵敗被俘，送往南京，最終被殺。⁹⁸過往的歷史書寫都認為黃道周挾帶大義之名出征，一度勢如破竹；但這種倫理道德至上的觀點與實際情況有相當大的出入。此次出師前後，當地官紳或其親友都對此行動頗為遲疑。如由黃道周推薦於

⁹⁵ 明·黃景昉，〈蒙遣官齋勅召不赴難自明書用寫歎〉，《甌安館詩集》，卷6，頁4。

⁹⁶ 明·黃景昉，〈三山紀事〉，《甌安館詩集》，卷11，頁3。

⁹⁷ 明·黃景昉，〈哭黃石齋先生〉，《甌安館詩集》，卷11，頁4-5。

⁹⁸ 明·張岱，〈黃道周、金聲列傳〉，《石匱書後集》，臺灣文獻叢刊第28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卷37，頁318。

隆武朝廷任官的學生李世熊（1602-1686）（福建寧化人），⁹⁹他對於鄭芝龍頗為憤恨；因此在芝龍降清後，李世熊隨即在他於崇禎九年成書的〈春秋涉錄序〉文末補了一句：「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逆節之誅，吾是以感歎私論之也。」藉此咒罵鄭芝龍早有負國之志。¹⁰⁰即便如此憎惡鄭芝龍、也在隆武朝廷任官，他仍於順治二年（隆武元年）寫信勸阻黃道周出師，提醒尚有現實問題待解決，其中最急迫就是軍餉問題，但黃道周卻不以為然，堅持出兵。¹⁰¹由此可知，即便其親友亦不支持這場作戰。因此，從李世熊的觀點而言，在鄭芝龍降清前，當黃道周欲以大義名份出師時，他並未對鄭芝龍有任何批評；換言之，他認為關鍵在於當時並未準備好出征一事，但當鄭芝龍降清後，他批評其「負國之志」。

黃道周抵達衢州時，廣信知府前往迎接黃道周，並且「陳說利害，道周遂行」，此後進入展開了「無食、無兵」的扁擔兵千人。隆武帝命令張家玉（1615-1647）屯金溪以助之，同時黃道周夫人蔡氏亦聚兵，但也因缺乏糧食而去。¹⁰²換言之，官員們都希望勸說黃道周放棄出征的行動，且缺乏糧餉是一種普遍現象，即便其妻也無法擺脫缺糧缺餉的窘況而自行解散部隊。北伐前夕，李世熊甚至是黃道周本人都曾對於糧餉不繼之事有了心理準備，黃道周出征之後也曾稱：「兵餉細事不足以煩陛下。」¹⁰³黃道周出兵後，朝廷並未撥「軍餉」，而是由隆武帝及眾臣捐銀兩支持其軍餉，後來道周募得十營共 3,840 人的軍力，並向諸州縣借調銀兩，維持當時同樣在邊關的十二營明軍，在抵達邊關時，聲稱已備妥十日糧餉，「不憂不繼」，且當時建陽地區捐贈錢兩尚餘有

⁹⁹ 清·李世熊，〈謝黃石齋老師薦舉書〉，《寒支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89 冊，景印清初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6，頁 10-11。

¹⁰⁰ 清·李世熊，〈春秋涉錄序〉，《寒支初集》，卷 4，頁 16-18。

¹⁰¹ 清·李世熊，〈再上石齋黃老師書記〉，《寒支初集》，卷 6，頁 12-16；清·李世熊，〈褒鄜孤忠疏〉，《寒支初集》，卷 10，頁 1-5。

¹⁰² 清·倪在田，〈江西之亂〉，《續明紀事本末》，臺灣文獻叢刊第 13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卷 8，頁 199。

¹⁰³ 明·黃道周，〈江浙機權疏〉，《黃漳浦集》，卷 5，頁 9。

4,477兩。黃道周的確只能從官員處獲得資助，他曾明確的指出：「今士大夫築一亭榭輒費數萬之金，至於恢復神京則素手從我。」¹⁰⁴若真的是針對鄭芝龍，身為隆武朝廷文官第一人，或許不因怕得罪鄭芝龍而僅說是「士大夫」；更何況鄭芝龍並非黃道周定義上的「士大夫」。甚至，當黃道周在作戰時，他也曾稱鄭鴻逵的軍隊曾協守側方。¹⁰⁵換言之，並未有任何資料指出，黃道周無餉出自鄭芝龍指使。縱如李世熊、黃景昉等在當地且熟知情況、且相當厭惡鄭芝龍的驕橫專權的仕紳官員，也都未曾指責鄭芝龍；甚至連黃道周本人也從未在缺糧出征下，明示暗指鄭芝龍需替此負責。¹⁰⁶

鄭芝龍降清後，翻閱當時各類文集、資料，似乎均未提到黃道周和鄭芝龍之間的紀錄。曾在北京居住三年的談遷收集資料以訂正《國權》之內容，並和吳偉業、曹溶（1613-1685）、霍達（?-1661）等人交往密切。順治十年九月初抵北京後，在隔年九月與時任大理寺少卿、吳偉業之同年（崇禎四年進士）與好友的霍達（順治十一年七月到十二年三月任該職）詳談時，並從其手中拿到黃道周的「秘錄」並抄錄之，雙方曾就其中內容長談。¹⁰⁷此外，談遷曾訪問吳偉業，雙方秉燭夜談黃道周之事，僅提到吳、黃二人明末的交往。¹⁰⁸吳偉業的資料可能也是目前我們所知，能夠確切定位時間發生於這一段時間的資料：他抒發情緒寫下〈即事〉詩共十首，

¹⁰⁴ 明·黃道周，〈將出關疏〉，《黃漳浦集》，卷5，頁5-6；黃道周，〈江浙機權疏〉，《黃漳浦集》，卷5，頁11-12。

¹⁰⁵ 明·黃道周，〈續報情形疏〉，《黃漳浦文選》，臺灣文獻叢刊第13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卷2，頁154-155。

¹⁰⁶ 實際上，大約直到順治、康熙年間，在民間有關黃道周的敘事，百姓傳說中仍是把黃道周被擒，與此道德對立面者並非鄭芝龍，而是洪承疇；參見清·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4輯，第21冊，景印清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8，頁22。

¹⁰⁷ 清·談遷，《北游錄》，紀郵上，頁81。其任官期間可參見《清世祖實錄》，卷85，頁667，順治十一年七月戊子條；卷90，頁708，順治十二年三月戊戌條。例如清·吳偉業，〈嘉湖訪同年霍魯齋觀察四首〉，《梅村家藏稿》，卷4，頁11。

¹⁰⁸ 清·談遷，《北游錄》，紀文，頁259-260。

其中第八首諷刺鄭芝龍的囂張跋扈以及狡詐等情事。¹⁰⁹十二年二月，談遷也前往朱昇（生卒年不詳，字方菴）與論及黃道周的往事。¹¹⁰談遷在北京的時間，正好橫跨了支持鄭芝龍者陸續倒臺的事情，並與黃道周學生如吳偉業、霍達等為好友，與二人均曾長談、甚至在北京城閱覽過黃道周留下的「秘錄」者。隨後，談遷完成《北遊錄》的書寫，當中不少篇幅談論鄭成功與鄭芝龍的書信往來、闡述鄭成功效忠大明的態度，並且在〈紀聞〉一篇中提及：「南安伯鄭芝龍在閩跋扈無人臣禮」。¹¹¹這些有關鄭芝龍在隆武朝廷的跋扈行為，延續了諸如黃景昉、吳偉業等觀點。

又黃道周被擄、被殺之時，不少文人都寫過相關的詩句、紀錄弔念之。順治四年發生的函可案文字獄之主角函可（1612-1660），曾寫下〈聞黃石齋至〉一詩：「驚傳一騎到江干，繞遍梅花淚未乾，鄧禹幾能扶漢室，鍾儀終不改南冠。空餘短劍龍文暗，好付殘軀馬革寒，豈為綈袍今哭汝，澗天風雨正漫漫。」¹¹²此詩自是寫於黃道周被俘虜後送往南京的路上，並引鄧禹（2-58）輔佐漢光武帝（5B.C-A.D.57，A.D.25-57在位）屢屢出征立下戰功還有春秋鍾儀（生卒年不詳）被囚多年終不改志之典——當然函可應該不知道黃道周不會如鍾儀般被囚而是直接被殺。此與陳子龍同為文社創始人之一、一生矢志抗清的徐孚遠在〈再哭黃石齋先生〉一詩中，委婉地說道：「四壁諸侯皆緩帶」等語，並未對鄭芝龍做出更激進的評論或是責罵。¹¹³顯然，這些明遺民之所以埋怨鄭芝龍，是聚焦他在隆武朝的專權。

¹⁰⁹ 此觀點來自清代文人靳榮藩認為詩意：參見清·吳偉業著，靳榮藩注，《吳詩集覽》，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景印乾隆四十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3下，頁11-12。

¹¹⁰ 清·談遷，《北遊錄》，紀郵下，頁96。

¹¹¹ 清·談遷，《北遊錄》，紀聞下，頁384。

¹¹² 明·釋函可，〈雲齋落成〉，《千山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8，頁9。

¹¹³ 明·徐孚遠，〈七言律詩一百六十六首〉，《鈞璜堂存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4冊，景印民國十五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12，頁20。

南明史家楊國楨（生卒年不詳）、柳亞子（1887-1958）都相當推崇為隆武一朝史料最齊全的《思文大紀》，雖然我們並不知道此書的確切成書時間和作者，一種臆測是明末吳江戴笠（1614-1682）所書、一種則是福州陳燕翼（生卒年不詳），但重要的是「書中頗載當時詔諭奏疏，皆為直接史料，尤為可貴。」¹¹⁴此書中關於黃道周出師北伐的描述中稱：

（隆武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輔臣黃道周兵至婺源，為清所陷，並門徒主事趙士超、中書毛玄水、蔡時培、賴叔儒四人縛送南京。時輔臣未領朝廷帑金，苦心聯絡，激勸忠勇，糾合義旅九千餘人，從廣信而出金、衢，安插遺黎，孤城捍衛，前後擒斬偽官，動以百計。且救徽、援衢，厥有成功。適衢撫某與輔臣議論不投，忌其師屯境上，遂密疏其短於朝廷，輔臣初不覺也。繼而請兵不至，始知其繇。乃與士超議曰：「朝廷置鄭兵各路七月於茲矣，未見與敵一矢相加遺。敵勢愈猖，不幾笑朝廷無人耶？我輩為天下倚重，必先聲一舉，為諸路倡！」遂決意長驅，深入婺源谷中，遇清騎數千。輔臣親冒矢石，誓不與清俱生。¹¹⁵

由上推知當時黃道周並未領取朝廷軍餉，對照李世熊的書信中得知確為事實。然而，在這當中並未談到是鄭芝龍所導致，頂多對於鄭芝龍軍隊未與清廷交戰感到不悅；同時，何嘗不是闡明鄭軍在防守抵禦清軍的功勞；相反地，整起事件中，誹謗者反而是衢州巡撫。¹¹⁶黃道周死後，《思文大紀》載：「贈輔臣黃道周為文

¹¹⁴ 參見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512-513。不著撰人，《思文大紀》，臺灣文獻叢刊第11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弁言〉，頁1。

¹¹⁵ 不著撰人，《思文大紀》，卷3，頁22-23。

¹¹⁶ 此時的巡撫為何人還有待更多的考證，例如王景亮、徐世蔭、周定初、黃鳴駿等人均曾在這段時間巡撫衢州；參見清·溫睿臨，《南疆譯史》，臺灣文獻叢刊第13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卷23，頁342。明·黃道周，〈招諭太子太傅戎政尚書張國維詔〉，《黃漳浦文選》，卷3，頁184-185；吳幅員編，

明伯，謚曰『忠烈』；平彝侯鄭芝龍疏陳孤臣矢心盡忠。」¹¹⁷換句話說，在羅引直接史料的記載中，鄭芝龍是領銜在黃道周殉難時上奏給予謚號者，並對其家人進行賞賜、恩典。

那麼，將鄭芝龍跋扈進一步與「黃道周之死負責」相結合的史料又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目前所知，最早有類似紀錄的是查繼佐（1601-1676）之書寫。查繼佐曾經被列入莊廷鑑（?-1660）《明書》名單上，同時被列名其中的還有陳子龍好友陸圻（生卒年不詳）。隨後，查繼佐的《罪惟錄》於康熙二年（1663）左右成書、其學生沈起（生卒年不詳）補述〈舟山後語〉中亦出現了鄭芝龍與黃道周直接衝突之句：

閣臣黃道周素與芝龍不協，議輒相左；廷臣咸論奏芝龍逗遛，芝龍益阻駕自重。已鴻逵率兵北出，次婺源不進；督師道周被執死之，鴻逵棄師遁。¹¹⁸

除此之外，也初次出現更多細節描述：

見同官黃道周素與鄭氏不協，疏劾芝龍，言官附之，以攻鄭為能。蜺淵（按：指張肯堂）難之曰：「今立國伊始，須有權宜以備緩急。鄭即傲，頗好名，曷姑與共事？且兵勢全屬鄭，非兼仁與義，通常與變，無以服鄭。」¹¹⁹

並將黃道周出師之事歸咎於二人不合：「閣臣黃道周素與芝龍不協，議輒相左。及道周率諸師北上，鴻逵次婺源不進，道周被執，死之。」¹²⁰

當時未在清廷為官，但與黃道周、吳偉業等人均為好友，明

《通鑑輯覽明季編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28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卷下，頁 85。

¹¹⁷ 不著撰人，《思文大紀》，卷 7，頁 9-10。

¹¹⁸ 明·查繼佐，〈抗運諸臣傳〉，《罪惟錄》，傳 9 下，頁 48。

¹¹⁹ 明·查繼佐，〈舟山後語〉，《東山國語》，臺灣文獻叢刊第 16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29。

¹²⁰ 明·查繼佐，《東山國語》，〈臺灣後語〉，頁 95。

末清初時期重要的文史學家張岱（1597-1684）。他自順治十四年後運用崇禎朝材料開始書寫、康熙年間成書的《石匱書後集》，這一本書可能更為重要中的一次記錄稱：

先是閩京尚講門戶，閣臣黃道周素與鄭芝龍不協，每事牴牾，於是諸臣交章論芝龍逗遛以附道周。而道周論事固執，不能善用鄭氏。閣臣觀生，力勸上出師贛州，以信天下。科臣金堡至請上倣漢高皇帝故事，自稱使者，單騎走贛，楊、萬軍并勅諸路並進，不省。乃芝龍果與清約，俟擠魯錢江，當盡撤嶺上以待，固不欲帝出，且挾以自重，閣部道周同定鹵侯鄭鴻逵不進，道周以二十餘騎前導，被執至南京死之。¹²¹

值得注意有二。首先，張岱獲得的資料已有協助谷應泰（1620-1690）修史時所獲得源於明朝廷的材料；¹²²其次，文中將黃道周為前導卻被清軍所執之事，怪罪鄭鴻逵不欲出兵之事，對於鄭芝龍也已經開始產生二人不睦之說法；實際上，此書亦提到甲申之變時，黃道周曾約鄭芝龍「起義」，但後者不願，並在隨後隆武帝即位後，雙方：「道周密陳芝龍不可恃，然閩、粵之勢已盡屬鄭氏；鄭氏素恨道周，益不為用。」並在出時「同定鹵侯鄭鴻逵之師北進；鄭芝龍不與一錢，隆武給空筭百道為行資而已。」¹²³這樣的敘事此前從未出現。張岱與其好友查繼佐編修史書相互影響。¹²⁴換言之，從康熙二年查繼佐到康熙初年張岱《石匱書後集》，出現了此前並未出現的黃、鄭不睦之事已經幾乎是在此前並未出現的說法開始初見端倪。

¹²¹ 明·張岱，〈唐王世家〉，《石匱書後集》，卷5，頁72-73。

¹²² 可參見史景遷著，溫洽溢譯，《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頁231-232。

¹²³ 明·張岱，〈黃道周、金聲列傳〉，《石匱書後集》，卷37，頁317。

¹²⁴ 張岱作史的過程中，學者認為他以「德行」為主要依據，其中又細分為理學、忠烈、忠節、忠諫、孝烈、義烈、節烈、清介、剛正、盛德、隱遁、生孝等12種。參見李燦朝，〈明清之際私家撰史的歷史意義——以張岱及其史著為中心〉，《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2（成都，2005），頁123-126。

康熙四年（1665）成書的《明季南略》對這整件事情的描述類似之外，¹²⁵又多了一段從前未有的資訊，該書記載：

大學士黃道周憤師不前，因請以師相募兵江西；曰：「江西多臣子弟，願招之效死軍前。」隆武命芝龍助資，芝龍不與；隆武給空劄百函而已。¹²⁶

同時這也是首次有資料揭示鄭芝龍不資助軍餉一事。換言之，從查繼佐、張岱等開始把過去鄭芝龍降清後原先停留在文人中關於跋扈不臣的抱怨，與黃道周兵敗、被俘、遭殺的論述相結合，進而將道周之死歸咎於鄭黃不睦而非黃道周以卵擊石的不智之舉。

再以活動於明末清初、劉宗周（1578-1645）的學生黃宗羲（1610-1695）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鄭克塽（1670-1707）降清後所書寫的資料為例。黃宗羲為明末清初大儒，其師與黃道周關係密切。¹²⁷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對於黃道周的記載，提到了賜宴位階排列之事，雙方最後以「鄭氏辭屈嫌隙遂成」，隨後黃道周認為鄭芝龍沒有經略之志，因此自請出征，所以用忠義激發募兵：「相與爭執，鄭氏辭屈，嫌隙遂成。先生視鄭氏殊無經畧之志，自請出關。然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徒以忠義激發，旬

¹²⁵ 此書作者計六奇與黃道周亦有一層關係：計六奇之舅胡時亨為崇禎十二年（1639）進士，當時的座師為沈延嘉，弘光朝時官任給事中，而沈延嘉之座師正是黃道周。清·計六奇，〈黃道周廷杖〉，《明季北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40冊，景印清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6，頁5；民國·林學增修，吳錫璜纂，《同安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第4冊，景印民國十八年刻本（上海：上海書店，2000），卷28，頁38；清·曾國藩、劉坤一等修，劉繹、趙之謙等纂，〈官積錄三〉，《江西通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656-660冊，景印光緒七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28，頁77。

¹²⁶ 清·計六奇，〈黃道周不屈〉，《明季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4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卷11，頁318-319。

¹²⁷ 道周曾在崇禎十年的〈三罪四恥七不如疏〉中稱「正如今日諸臣，品行高峻，卓出倫表，則臣不如劉宗周。」亦曾在南明潞王黨爭渾沌之際，力推其評價極高的劉宗周任官。劉宗周在寫給溫體仁的書信中，讚許黃道周為「中外無不頌聖人」。並也在寫給黃道周的信件中勸慰其為臣報國之道。明·黃道周，〈三罪四恥七不如疏〉，《黃漳浦文選》，卷1，頁35；明·黃道周，〈請召劉宗周、姜曰廣、高宏圖、楊廷麟、劉同升以收人心箋〉，《黃漳浦文選》，卷3，頁165。

月之間揭竿雲集。」¹²⁸同樣的說法也被用於黃宗羲的另一本作品《賜姓始末》中，對鄭芝龍的描述花費大量篇幅論述其早年海上活動與劉香（生卒年不詳）之戰的勇猛，對於南明時期僅寥寥數語，主要闡述擁立封爵、退居安海、接受招撫。¹²⁹不過，在該書其後所附的《隆武紀年》中，提及雙方因朝中位列而相爭執，並寫下：「芝龍不與一兵」。¹³⁰這些資料或承襲前面康熙年間資料所書寫。

康熙末年、雍正初，由萬斯同（1638-1702）所主纂的《明史》，也描寫著同樣的賜宴爭位之說，並且提到隆武皇帝對於諸生上書批評黃道周之事「王知出芝龍意下」。隨後提到「國勢衰微，兵食俱乏」，而鄭氏諸將觀望不出，「道周憤自請督師」出兵廣信、衢州。¹³¹雍正十一年（1733）成書的《東林書院志》抄錄承襲之。¹³²與此同時，康熙末年成書、溫睿臨原本所書的《南疆逸史》30卷，後在道光八年（1828）由李瑤所補纂後18卷而成的《南疆繹史》。溫睿臨（生卒年不詳）為康熙四十四年（1705）舉人，官至內閣中書，與編修《明史》的萬斯同關係密切，在萬斯同《明史》中，提及黃、鄭關係時，提及隆武帝賜宴官員，鄭芝龍欲以侯爵之姿居上位，但黃道周卻持反對意見，因此文、武雙方互相齟齬。萬斯同在文中稱當時軍官以鄭芝龍馬首是瞻，因此不願出兵，黃道周因此「憤自請督師」，啓行時僅攜帶「一月糧」，並且鼓動「忠義士」，最終「得卒九千餘人」。¹³³該書載

¹²⁸ 清·黃宗羲，〈諸儒學案下四〉，《明儒學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56冊，康熙十五年成書），卷56，頁5-6。

¹²⁹ 清·黃宗羲，〈鄭成功傳〉，《賜姓始末》，臺灣文獻叢刊第2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卷2，頁10-13。

¹³⁰ 清·黃宗羲，〈隆武紀年〉，《賜姓始末》，頁51-53。

¹³¹ 清·萬斯同，〈列傳二百十一·劉宗周、黃道周〉，《明史》，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景印清抄本（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卷360，頁32。

¹³² 清·高廷珍，〈列傳四〉，《東林書院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10，頁23-30。

¹³³ 清·萬斯同，〈列傳二百十一·劉宗周、黃道周〉，《明史》，卷360，頁32。

黃道周出兵時：「請兵請糧，芝龍皆不應」。¹³⁴

此外，前述《思文大紀》有關鄭芝龍要求給予諡號者。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左右成書的《燭火錄》，亦產生改變：

唐王聞黃道周被害，震悼輟朝。黃斌卿疏陳：「古今多一精忠，中興少一名相！」王覽奏曰：「輔臣道局精忠大節，就義從容，真足感動天人、爭光日月。朕方恢中興大業，而一代純臣先殉國難；撫念今昔，倍為愴懷！翁龍楠現在何處？著該部再行察訪，務得實信回奏，以憑從優卹錄。其毛玄水四員，並與察卹」¹³⁵

隆武帝所說的話中，內容雖然較為簡略，但仍可看出二者所述是同一事。然而，上奏疏陳者從鄭芝龍變成了與黃道周關係較好的黃斌卿。¹³⁶

鄭芝龍和黃道周之間對比加大的關鍵則是官方資料的書寫。乾隆四十年（1775）十月，由乾隆皇帝下令編修的《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該序中即稱黃道周等人為一代完人。¹³⁷黃道周更被列於「專諡」的諸臣當中，對他評語則為：「黃道周碩學清操，孤忠亮節，克全儒行，無愧負臣，今諡忠端。」¹³⁸也如乾隆皇帝下令傅恒（1721-1770）等人所編寫的《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中，援引了萬斯同的「得卒九千餘人」一詞，但是該文又引用了《明季南

¹³⁴ 清·溫睿臨撰，李瑤輯，〈儒臣列傳五〉，《南疆釋史》，卷11，頁161。

¹³⁵ 清·李天根，〈丙戌夏四月丁丑朔〉，《燭火錄》，臺灣文獻叢刊第17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卷15，頁806。

¹³⁶ 黃斌卿，福建莆田，當崇禎四年黃道周乞休返鄉直到九年年底方返回京師，這段時間黃道周家鄉的軍事將領即是黃斌卿。或許因黃姓，又道周祖先來自莆田，且黃斌卿略通文采，不是普通武將，著作驚人，且隆武元年，時任大學士的黃道周推薦蔣德璟、林欲楫、朱繼祚以及黃斌卿等人為官。參見盧正恆，〈明清之際浙江將領黃斌卿研究〉，《清史論叢》，2015：2（北京，2015.10），頁90-106。

¹³⁷ 清·舒赫德、于敏中等撰，〈上諭〉，《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13-214冊，乾隆四十一年成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1。

¹³⁸ 清·舒赫德、于敏中等撰，〈專諡諸臣〉，《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卷1，頁9。

略》中的「聿鍵給空筈百函」，這樣組合式的知識和說法也符合當時乾隆皇帝所欲闡述的忠君愛國。¹³⁹因此，對黃道周的推崇到了嘉慶時期，文人張祥河（1785-1862）就曾撰詩讚揚黃道周：「國士相從黃閣老，驕兵誤煞鄭元戎。」¹⁴⁰加上同時編纂的《貳臣傳》和《逆臣傳》，鄭芝龍更是被列入「逆臣」，乾隆皇帝利用編史來達成政治目的之手段，同時也把鄭芝龍打入忠君愛國這樣儒家思想的最佳反面教材。¹⁴¹

黃道周死節的事件記載約在清中葉以後有更明顯的變化。清中葉的《南天痕》亦記載道：「大學士黃道周與芝龍議不合，自請出督師，芝龍僅給贏卒千；甫出關而潰，道周被執。」¹⁴²相較於萬斯同《明史》，從原先的自睦忠義士、卒九千，變成鄭芝龍給予「贏卒千」；暗示著即使連軍隊作戰能力不高，仍是鄭芝龍之故。同治、光緒年間時越來越詳盡，這時成書的《續明紀事本末》更描述黃道周到達延平後：「乞餉，芝龍復不予，更使人讒之。」¹⁴³在描述擁戴唐王時，或許是從《南天痕》抄錄來的資訊，稱：

在藉禮部尚書黃道周、叛將鄭芝龍三箋勸進；芝龍無推戴意，以鴻達故，勉為之。丁亥，至福州，稱監國。諭軍民陳事，詞意剴切。有議即真者；侍郎李長倩請急出關，緩正位，示無富天下意。黃道周謂出關尺寸，建號非遲。芝龍爭尤力，實有異志。¹⁴⁴

¹³⁹ 清·傅恒，〈明唐桂二王本末〉，《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117，頁10-11。

¹⁴⁰ 清·張祥河，〈明紀善邱公父子忠孝詩〉，《小重山房詩詞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景印道光年間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詩餘詩續卷2，頁1。

¹⁴¹ 參見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183-259。

¹⁴² 清·凌雪，〈列傳三十八〉，《南天痕》，臺灣文獻叢刊第7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卷25，頁418。

¹⁴³ 清·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卷7，頁138。

¹⁴⁴ 清·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卷7，頁135。

雖然成書時間最晚，但僅此書才出現許多細節，型塑自此完成，也成為了近代學者引用或是探討這段歷史的主要材料來源，也可說是鄭芝龍逆臣、不願仕明、與儒家文人意見相左等海盜的歷史記憶已經定型。由此可知，對鄭芝龍的文學、史書批評大量出現於康熙初，其中又以黃道周好友查繼佐、張岱等人的史料最為後世所使用，且原先張岱、查繼佐中批評鄭鴻逵的部分也不再出現。隨著時間的變化，類似的記載則漸漸偏頗，到了乾隆年間修訂《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之後，將黃道周推至高峰，而鄭芝龍則就此落於惡名。

綜上所述，隆武時期的黃道周和鄭芝龍或有隔閡，然而根據現有的稀疏資料卻無法看到彼此有多少的嫌隙；甚至當黃道周不顧反對出兵被殺後，領銜建議給予諡號者還是鄭芝龍。然而，不可否認諸如吳偉業等與黃道周相友善者，對於鄭芝龍專權之惡多有批評。然而，這些友人亦都清楚，黃道周此行原先就是以卵擊石，且不少證據也顯示鄭芝龍並未就此事有過積極的介入，甚至「害死」黃道周，因此他們只能從情緒上進行抒發，訴諸於文字寫作上，強調鄭芝龍的專權。待康熙初年，從順治年間開始編修的資料卻漸漸把鄭芝龍擅權跋扈和黃道周之死進行連結，這些書寫者均可與黃道周或是順治朝遺民有資料傳抄、師徒關係。他們有關忠孝節義情感的闡述，在康熙末、雍正逐漸變成史書的材料，最終甚至進到了乾隆時期國家編纂的資料，建構出了「鄭芝龍害死黃道周」這樣的歷史記憶。

也在當地抗清軍隊的幫助下，步步進逼廣州城。¹⁴⁵這些歷史事實無一不影響著他的生命變化。

本文嘗試論述，鄭芝龍願意降清並非識人不明，亦非對局勢的不清，實是因為直接招撫他的人是當時權傾朝野、時值壯年的攝政王多爾袞，且他在朝中的人脈網絡包括當時漢人官員中重要者，例如陳名夏與洪承疇等。即便如此，他仍然將其軍隊留在南方，配合南方諸部將散佈於各政權中、並且仍舊壟斷海外貿易；即便從結果論的觀點認識，也會發現他確實已有了妥善的安排和把握才敢前往北京。通過史料可以理解到鄭芝龍在北京主動性仍在，並非如過去對他赴北後處於一種時時被監控的「軟禁」狀態。現實的局面從多爾袞驟然去世，接著將近一年的黨爭迅速展開，鄭芝龍被迫牽連入。隨著鄭成功同時在南方整合既有勢力，並且拓展自己的控制範圍，甚至隨後宣稱加入李定國的東征軍，鄭芝龍的利用價值逐步消失，朝臣針對鄭芝龍彈劾開始出現。

這些彈劾是政治性的，他們也都是「黃道周」的親友學生；然而，若依據這樣就簡單地說他們的彈劾是在報仇，卻又是過度簡化整起事件。探索這段時期明遺民、尤其黃道周好友們的說法，可以發現他們厭惡鄭芝龍的專權；當黃道周被殺後，他們在忠、孝的情緒抒發，再次重申鄭芝龍專權一事。然而，包含黃道周在內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出兵將遭遇到糧餉問題，不過也未有任何人曾歸咎怪罪鄭芝龍需替此負責。「鄭芝龍害死黃道周」的說法在康熙年間才結合順治朝的跋扈說法，但僅出現於民間史家的說法，直到乾隆時期才在皇帝、國家的主導下，成為國家的主流論述，甚至最終變成關於鄭芝龍的易代歷史記憶。

簡言之，順治四年到八年之間，在舊「東林黨」與多爾袞黨的庇護之下，鄭芝龍在北京過著相對無慮的生活，經濟上的優渥讓他的商業帝國仍舊在運行，甚至不受戰亂阻礙。然而，多爾袞黨和陳名夏等人相繼倒臺、伊爾德獲得啟用之際、鄭成功在南方

¹⁴⁵ 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頁136-138、142-153；謝國楨，《南明史略》，頁188；顧誠，《南明史》，頁782-840。

的叛撫不定、永曆朝廷的反撲，都造成清廷內部無比的動盪。與此同時，黃道周舊友、學生終於有管道可以發洩對鄭芝龍的不滿，正白旗的漳州人楊國永、朝中重臣龔鼎孳、張秉貞、在野史家吳偉業等人獲得新興統治階層的支持，得以指控鄭芝龍的所作所為，包括提供軍情給鄭成功等。雖然並不是簡單二分法來解釋多爾袞的倒臺與黃道周親友的攻訐導致鄭芝龍的失勢，但是朝中複雜的人際網絡和各自利益、政治目的取向，都在在影響著鄭芝龍的一生，還有他的後續評述。

（責任編輯：林煒恩 校對：劉冠宏）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一) 檔案

- 明·顧秉謙等纂修，《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溫體仁等纂修，《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不著撰人，《崇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查繼佐，《東山國語》，臺灣文獻叢刊第 16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明·查繼佐，《罪惟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321-323 冊，景印民國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談遷，《北游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737 冊，景印清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臺灣文獻叢刊第 13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馬齊等修，《清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郝玉麟等監修，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85-28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廖必琦、宮兆麟等修，宋若霖等纂，《莆田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景印民國十五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 清·陳鏞，王作霖，蔡廷推，鄧來祚纂修，《海澄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第 30 冊，景印乾隆二十七年刻本，上海：上海書店，2000。
- 清·舒赫德、于敏中等撰，《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13-2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逆臣傳〉，《傳稿》，景印清史館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故傳 006388。
- 清·鐵保等纂修，《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 422-42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嵇璜、劉墉等奉敕撰，紀昀等校訂，《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32-63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覺羅果科列傳〉，《傳稿》，清史館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故傳 006074。
- 清·溫睿臨撰，李瑤輯，《南疆譯史》，臺灣文獻叢刊第 13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清·胡之銜修，周學智、尤遜恭等纂，《晉江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第 25 冊，上海：上海書店，2000。
- 清·史澄等纂，瑞麟，戴肇辰等修，《廣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景印光緒五年刊本，第 1-2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 清·曾國藩、劉坤一等修，劉繹、趙之謙等纂，《江西通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656-660 冊，景印光緒七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蘇鏡潭纂修，《南安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第 28 冊，景印民國時期刊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 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
- 民國·林學增修，吳錫璜纂，《同安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第 4 冊，景印民國十八年刻本，上海：上海書店，2000。

（二）史料彙編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99。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
- 吳幅員編，《通鑑輯覽明季編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28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年。
-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一）》，《臺灣文獻匯刊》，第 6 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二）》，《臺灣

文獻匯刊》，第7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主編，《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三）文集

明·釋函可，《千山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明·劉宗周，《劉戡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不著人撰，《思文大紀》，臺灣文獻叢刊第11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明·黃景昉，《甌安館詩集》，景印明刊本，東京：高橋寫真館，1990。

明·陳子龍，《安雅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明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明·陳名夏，《石雲居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冊，景印順治年間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明·文秉，《烈皇小識》，臺灣文獻叢刊第26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

明·徐孚遠，《鈞璜堂存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4冊，景印民國十五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梅村野史，《鹿樵紀聞》，臺灣文獻叢刊第12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清·李天根，《燭火錄》，臺灣文獻叢刊第17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清·吳偉業，《梅村家藏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9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吳偉業，《梅村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康熙七年成書）。

清·吳偉業著，靳榮藩注，《吳詩集覽》，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景印乾隆四十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56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清·黃宗羲，《賜姓始末》，臺灣文獻叢刊第2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清·宋璧輿，《林屋詩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8冊，景印康熙年間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李天根，《燭火錄》，臺灣文獻叢刊第17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明·張岱，《石匱書後集》，臺灣文獻叢刊第28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
- 清·李世熊，《寒支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第89冊，景印清初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4輯，第21冊，景印清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阮旻錫，《海上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40冊，景印清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4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清·凌雪，《南天痕》，臺灣文獻叢刊第7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清·萬斯同，《明史》，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景印清抄本，合肥：黃山書社，2009。
- 明·莊起儔，《黃忠端公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景印道光九年刻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 清·高廷珍，《東林書院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傅恒等修，《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3-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王先謙，《東華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十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張祥河，《小重山房詩詞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13冊，景印道光年間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程恩澤，《程侍郎遺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咸豐五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黃道周，《黃漳浦集》，《叢書集成》，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三編，第52-53冊。
- 明·黃道周，《黃漳浦文選》，臺灣文獻叢刊第13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清·陳乃乾、陳洙纂輯，《徐閣公先生年譜》，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4冊，景印民國十五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二、近人專書

-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2012。
- 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09。
- 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臺北：三民書局，2006。
- 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臺北，2000.6，頁77-158。
-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
- 吳正龍，《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 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林麗月，《奢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
- 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 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62。
-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 謝國楨，《南明史略》，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
-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
- Struve, Lynn A.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Andrade, Tonio.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 Andrade, Tonio.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Cheng, Weichung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Leiden: Brill, 2013.
- Hang, Xing. *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 1620-17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三、近人論文

- 王于飛，〈陳名夏之死與順治改制內幕〉，《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科版》，25：7，成都，2004.7，頁458-463。
- 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文收周質平、Willard J. Peterson 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頁367-418。
- 王璦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變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4，臺北，2004.3，頁39-103。
- 王鍾翰，〈洪承疇的歷史功過問題〉，收入王鍾翰，《清史餘考》，瀋

- 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頁147-155。
- 吳志鏗，〈清遺民的晚清記憶——劉聲木的個案研究〉，收入李國祈主編，《郭廷以先生百歲冥旦紀念史學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頁315-353。
- 吳秀玉，〈南明殉節大儒黃道周學說之時代地位〉，《宜蘭大學學報》，2，宜蘭，2004.3，頁113-126。
- 李卓穎，〈易代歷史書寫與明中葉蘇州張士誠記憶之復歸〉，《明代研究》，33，臺北，2019.12，頁1-60。
- 李燦朝，〈明清之際私家撰史的歷史意義——以張岱及其史著為中心〉，《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2，西安，2005.2，頁123-126。
- 林宜蓉，〈不入城之旅：明清之遺民徐枋的身分認同與生命安頓〉，《明代研究》，20，臺北，2013.6，頁59-98。
- 金澤中，《明清之際在野知識份子的歷史意識——以談遷《國權》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9。
- 許明德，〈明清之際夏允彝之死及其相關悼念詩文之敘事策略〉，《漢學研究》，32：4，2014.12，頁167-191。
- 張繼瑩，〈祇恐遺珠負九淵：明清易代與《偏關志》書寫〉，《明代研究》，27，臺北，2016.12，頁159-187。
- 陳永明，〈政治抑壓下的集體記憶——清初張煌言事蹟的傳播〉，《漢學研究》，34：2，臺北，2016.6，頁107-140。
- 陳在正，〈鄭芝龍在清鄭和談中所扮演的角色〉，《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88:3，臺北，1998.6，頁117-124。
- 細谷良夫，〈清朝中期八旗漢軍的再編組〉，收入石橋秀雄編，楊寧一、陳濤譯，《清代中國的若干問題》，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頁68-90。
- 陳逸雯，〈入山猶未晚：明宗室朱中楣的易代經歷與鄉國書寫〉，《明代研究》，31，臺北，2018.12，頁51-80。
- 趙寰熹，〈清代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政策的實施及其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8：1，西安，2013.1，頁134-143。

- 盧正恒，〈明清之際浙江將領黃斌卿研究〉，《清史論叢》，2015：2，北京，2015.10，頁90-106。
- 顧敏耀，〈海國英雄形象衍異與文學符碼重層解讀——臺灣清領時期古典詩中的鄭成功〉，《明道通識論叢》，9，埤頭，2010.12，頁53-79。
- 孔中華、鐘玲、陰劼，〈清代中期北京內城旗人居住狀況的考察與分析——基於乾隆《京城全圖》的研究〉，《滿族研究》，2016：4，瀋陽，2016.12，頁49-55。
- 鴛淵一，〈清朝順治初世の派閥的抗争に就いて：特に睿王派の結成について〉，《人文研究》，9：11，大阪，1958，頁1222-1243。
- Blussé, Leonard. "Minnan-jen or Cosmopolitan? The rise of Cheng Chihung alias Nicolas Iquan." In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edited by Eduard B. Vermeer, pp. 245-264. Leiden: Brill, 1990.
- Boxer, C. R. "The rise and fall of Nicholas Iquan (Cheng Chi-lung)." *T'ien Hsia Monthly*, 11: 5 (April-May, 1941), pp. 401-439.
- Lu, Cheng-Heng. "Between Bureaucrats and Bandits: the Rise of Zheng Zhilong and His Organization, the Zheng Ministry (Zheng Bu)." In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Maritime East Asia in World History, 1500-1700*. edited by Tonio Andrade and Xing Hang, pp. 132-15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 Struve, Lynn A. "Confucian PTSD: Reading Trauma in a Chinese Youngster's Memoir of 1653." *History & Memory*, 16:2, (Fall and Winter, 2004), pp. 14-31.

四、網路資料

- 〈精繪北京圖〉，收入《數位方輿》網站。<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jsp?id=A104000021> (2024/9/21)。

Symbiosis with the Qing: Zheng Zhilong and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Lu, Cheng-heng*

Abstract

Zheng Zhilong (1604-1661)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 Not only did he play a pivotal role in global exchange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e also greatly influenced the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y. Despite extensive scholarship on him,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his activities after he surrendered to the Qing dynasty in 1646. Scholars have traditionally focused on his role as a hostage meant to persuade his son, Zheng Chenggong, to surrender to the Qing court. He is often portrayed negatively, in contrast to loyalists like Zheng Chenggong and Huang Daozhou.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more nuanced portrait of Zheng Zhilong. It argues that his decision to surrender to the Qing was made only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t also examines his Banner affiliation, the structure of his social network in Beijing, and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his involvement in factional strife following the death of the regent Dorgon.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historical narratives about Zheng Zhilong evolved from a simple portrayal of an arrogant military leader to a more complex interpretation intertwining his life with the memory of Huang Daozhou's death. This reinterpretation of his life began in the Kangxi period and gained prominence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eventually developing into a near-mythical narrative that pitted Zheng Zhilong, the villain, against Huang Daozhou, the virtuous hero.

Keywords: Zheng Zhilong, Ming-Qing Transition, Dorgon, Huang Daozhou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